

宏觀視野

- 1 王道思想與世界秩序重組
朱雲漢
- 19 王道文化與二十一世紀大中華的道路
黃俊傑
- 27 從數位典藏到數位人文——談檔案的多重脈絡
項潔

多元觀點

- 29 "10th Anniversary Symposium" of the Helsinki University Collegium for Advanced Studies
Kirill O. Thompson
- 33 跨越國境的歷史與東亞——從日韓思想史的視域思考
桂島宣弘
- 35 日本人的中國革命傳統——論其再生與消逝
馬場公彥
- 39 韓國的「傳統」文化與現代政治經濟構造
宋錫源
- 41 韓、日「新型夥伴關係」——評估與展望
姜龍範
- 45 新時代的日臺關係與臺灣的日本研究
川島真
- 49 魏晉玄學宇宙本體思想的邏輯演進
康中乾

計畫近況

- 51 東亞儒學研究計畫
- 53 東亞民主研究計畫
- 55 東亞華人自我的心理學研究計畫
- 59 東亞法院與法律繼受研究計畫
- 63 東亞國家的貿易、勞動、金融與生產力研究計畫
- 67 東亞崛起中當代中國大陸的發展變遷與「中國研究」主體性的轉換研究計畫
- 71 數位人文研究整合平臺
- 73 東亞崛起中的日本與韓國研究整合平臺
- 75 歐盟研究整合平臺

院務新訊

- 77 新近出版品介紹
- 79 院務短波
- 83 院內大事紀

王道思想與世界秩序重組⁺

朱雲漢*



歷史巨變時代的到來

歷史的腳步在二十一世紀走得特別的快，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可以在很短時間內出現急遽的變化。從九一一事件、金磚五國興起、全球金融海嘯、G20 躍登歷史舞臺，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破局，歐元區國債危機全面爆發，到美國主權信用評等下調，一連串對人類社會未來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件，在我們眼前驚心動魄地展開，讓世人幾乎沒有喘息的機會。

我們面對這些石破天驚的歷史事件時，必須要有一種宏觀的視野，要認識到當前人類社會正處於一個百年難遇的歷史分水嶺。我在三年前一篇主題演講中，把這個重要歷史關頭稱之為「巨變時代」，¹ 這是我們熟悉的歷史座

標迅速消失的時代，也是我們視為當然的歷史趨勢出現轉折的時代。這個歷史大趨勢的轉折在上個世紀最後十年已經看到一些端倪，但一直到二十一世紀開端才以波濤洶湧之勢全面展開。這個大趨勢的變化主軸就是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以及西方世界的相對衰敗與式微。

最近幾年，不少敏銳的觀察家都不約而同的指出，我們正處於一場歷史大變局的開端。美國《新聞週刊》前任總編輯 Fareed Zakaria 在 2008 出版的《後美國時代的世界》（*The Post American World*）這本書就指出，當前的歷史變局是過去五百年來人類歷史第三次重要的結構性轉移。第一次是西歐的崛起，第二次是美國的崛起，第三次是非西方世界的崛起。² 從亞洲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三百年來歷史趨勢

+ 本文係 2011 年 12 月 2-3 日由中央大學、中華文化總會主辦，本院協辦之「王道文化與公義社會」研討會中發表之文章。

*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特聘研究員、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合聘教授、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1 朱雲漢：〈身處巨變時代的政治學者〉，中國政治學會 2008 年會主題演講（嘉義：中正大學，2008 年 9 月 27-28 日）。

2 Fareed 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 (New York: W. W. Norton, 2008).

的大反轉。在十八世紀初期，中國、印度與回教世界仍與西方分享世界舞臺，但是隨著工業革命以及殖民主義的擴張，亞洲各民族一一落入西方列強的宰制，西方國家主導了人類歷史長達三百年。然而，正如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 Kishore Mahbubani 教授在其新書「新亞洲半球」所言，進入二十一世紀世界權力的重心明顯向亞洲移動，亞洲將成為人類歷史舞臺上的要角。「新亞洲半球」的崛起，可以跟二十世紀崛起的西半球一樣撐起半邊天。在世界舞臺上西方國家獨佔鰲頭的時代已經告一段落。³

尤其在過去半個世紀裡，全球的生產活動重心加速向非西方世界移轉，我們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數字來說明，在不到四十年的時間裡，全球經濟實力與財富快速重新分配的趨勢。在第一次石油危機時，也就是 1973 年，用購買力等值（PPP）計算，西方國家（西歐、美國、加、紐、澳）的 GDP 佔全球 GDP 的比重約為 51%，所有其他國家只佔 49%；經過三十年，到了 2003 年西方國家的比重已經下降到 40.4%，非西方國家上升到 59.6%。從現在開始再往前推二十年，也就是到了 2030 左右，西方國家的比重會進一步下降到 32%，而非西方國家會繼續上升到 68%，其中印度與中國大陸合計將佔到 34% 以上。這意謂著我們過去熟悉的世界即將出現翻天覆地的改變。這是根據麥迪遜教授（Angus Maddison）在 2007 年所做的預測，現在看來他的估計對於非西方國家還過於保守，對西方國家的經濟成長動力反而過於樂觀。在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爆發之後，Paul Kedrosky 等已經將他的估計值進行

修正，西方國家的經濟成長速度將比他預估的更低，而拉丁美洲與非洲的後勢要比他預估的更好，所以到了 2030 年非西方世界的比重將超過他的預估。⁴

我們在思考這個歷史大變局時，需要一個更寬廣的視野、更長的歷史座標，一個類似麥迪遜教授「世界千年經濟史」這樣一個宏大的架構。麥迪遜的長程歷史觀點告訴我們，如果我們把歷史的跨度拉長為一千年的話，西方國家獨佔人類歷史舞臺可能是一千年裡面一個特殊的而不是一個常態的時期。根據麥迪遜的估算，在西元 1400 年前後（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的年代），以購買力等值估計，當時中國與印度兩國的國內生產毛額佔全世界 GDP 的 75%。雖然自此以後比重逐步下降，但遲至西元 1700 年，印度和中國合計仍佔有世界 GDP 的 46% 左右，各自都比今日美國在世界經濟的 21% 的份額略高一些。⁵ 所以，從這個最寬廣的角度來看，今日中國、印度與回教世界的崛起，嚴格說起來不是「崛起」，而是這三大文明板塊「恢復」他們歷史上享有的地位。亞洲的再興也會帶動拉丁美洲及非洲的崛起，全球的權力與財富分配結構將逐漸回復到西方興起之前更長時期的歷史常態。這對全世界人類來講，也是一個更公平、合理的經濟資源配置結構。

人類社會生產力與財富的差距會逐步回歸千年歷史常態，因為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列強已無法再用殖民手段掠奪第三世界的資源，也無法採用「戰爭發財」（或者說以「戰爭金融」）的模式來推動資本積累。⁶ 而且儘管西方

3 Kishore Mahbubani, *The New Asian Hemisphere: 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8).

4 參見 Angus Maddison, *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30 AD: Essays in Macro-Economic History*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也參見 Paul Kedrosky, "The World in 2030: The Poor Own the Place," October 24, 2010, accessible at http://paul.kedrosky.com/archives/2010/10/the_world_in_20_2.html.

5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Pari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2001).

6 典型的戰爭金融模式就是，舉債發動戰爭，然後用戰利品（割地賠款）還債，這是西方列強在二次世界大戰前資本

國家努力設法維持科技的領先與金融體系的支配地位，以及用智慧財產權與科技保護主義阻擋非西方國家的模仿，但畢竟無法真正阻止非西方國家的學習、自主創新與勤奮勞動。同時西方國家在戰後嬰兒潮陸續邁入退休年齡後，也不再享有人口紅利。所以，在過去半個世紀，西方國家的經濟競爭力跟非西方國家的差距在不斷縮小，西方國家能在科技和產業競爭力上保持優勢的領域越來越有限，不僅東亞國家全面快速追趕，中東、南亞與拉丁美洲也急起直追。新興工業化國家的龐大原物料與能源需求也為靠農業與工礦出口的貧窮開發中國家帶來翻身的機會，他們不再需要以廉價的原物料出口換取西方國家昂貴的工業產品。

伴隨著全球生產力以及財富重分配而來的是全球戰略格局、意識形態場域，以及全球治理體制的結構重組，這是無可避免的。所以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大趨勢中還同時包涵了三個層次的歷史結構重組：第一層的結構重組是全球戰略格局的巨變，以美國為核心的單極體系開始全面鬆動，多極體系正破繭而出；第二層的結構重組是全球意識形態場域的多元化，「一元現代性」（singular modernity）的歷史框架鬆動了，以「民主」與「市場」為崇拜對象的西方信仰體系出現動搖；第三層的結構重組是全球治理體制的調整與變革，由西方國家一手建構的，並以西方國家核心價值與利益為基礎的現存全球治理體制，正面臨功能失調與合法性不足的雙重挑戰。

多重的歷史結構重組

單極世界的隕落

最具影響力的紐約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會長 Richard Haass 在 2008

年 4 月號《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的專文中表示「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已經結束，二十一世紀將是一個無極世界」。他的「無極世界」預測是否準確，還可以商榷，但他的單極世界已經結束的宣告，非常具有代表性。

以美國為核心的單極體系形成於後冷戰時期開端，到目前為止不過二十年左右，所以是一個很短暫的歷史週期。九〇年代波斯灣戰爭結束後，美國被公認為唯一的超級強權，一手主導蘇聯瓦解後的新國際秩序。為什麼這個單極體系維持不到二十年就面臨式微？美國作為唯一超強的局面為什麼沒有辦法持續？從近因來看，當然「九一一事件」的爆發和美國進軍阿富汗與伊拉克，全盤打亂了美國的戰略佈局與資源配置，反恐戰爭與佔領兩個回教世界國家當然嚴重的拖累美國國力，加速了美國整體的頹勢。最近爆發的「次貸危機」則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但除此之外還有更根本的原因，從遠因來看大概可以歸納成幾點：

第一是經濟實力的長期下滑。美國的經濟結構長期面臨嚴重的「產業空洞化」，在製造業領域美國享有科技領先和產業競爭優勢的領域越來越有限，即使是出口導向產業也是將主要生產基地外移。美國過去二十年的經濟榮景，主要是依靠「虛擬經濟」在支撐。美國的高生活水準以及每年 3-4% 的增長率其實很大一部分是靠海外轉包生產以及虛擬財富，也就是靠中國與印度的廉價勞力以及金融資產泡沫。事實上，美國社會早已面臨中產階級萎縮，受薪階層實質所得停滯的問題，聯邦儲蓄委員會刻意長期維持寬鬆的信用政策，來支撐資產價格的泡沫與國內消費能力，讓美國中產階級享受財富增長的假象。在本質上，這等於是向未來透支，以及不斷向國外借貸來支撐它的繁榮。⁷

7 Raghuram G. Rajan, *Fault Lines: How Hidden Fractures Still Threaten the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美國的生產不足與過度消費也讓全球經濟一直處於結構性失衡狀態，美國拼命消費，亞洲拼命生產。美國印製美元購買進口商品，世界各國向美國提供商品而獲得美元，再用美元購買美國國債和企業證券充作本國外匯儲備，從而支撐了美國的消費能力。哈佛大學經濟史學家尼爾·弗格森 (Niall Ferguson) 曾一語道破：「這就像現代經濟史上最大的免費午餐。」⁸

但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從 1985 年開始，美國就由淨債權國變為淨債務國，到了 2007 年外國機構與個人對美國的淨債權總額已經超過美國的經濟規模。美國私人部門的整體負債，也從 1978 年 GDP 的 118% 增加到 2008 年的 290%。美國聯邦政府的負債總額在 2007 年底就已經達到了 GDP 的 65.5%，經過了 2008 年的金融危機之後，聯邦負債更是直線上升，2009 年第一季已經達到十一兆美金，而美國的 GDP 大約是 14.2 兆，所以很快就要逼近 GDP 的 100% 大關。然而，這個數字還不能反映美國國債真正的規模，根據美國 The Peter G. Peterson Foundation 執行長 David Walker (曾經擔任美國的財政部次長) 的估計，如果將美國政府的各種隱形負債 (例如對國民社會保險以及退伍軍人撫卹的支付義務) 累加起來，到 2007 年 9 月雷曼兄弟倒閉、美國金融危機急速惡化前，已經高達 53 兆美金，接近 2007 年全球 GDP 54.3 兆的規模。⁹ 所以說到了今天，美國的三大赤字：國債、貿易赤字和私人借債赤字都已經累積到了極限，難以為繼。

美國的國債危機更幾乎是一個無解方程式，2007 年年底美國國會預算局做過一個預測模型，隨著戰後嬰兒潮進入退休高峰期，到了

2025 年健保支出將上升到 GDP 的 25%，屆時美國聯邦政府的收入僅夠支付國債利息以及政府承擔的醫療費用，沒有任何經費可以用於其他政務項目，包括國防、教育、科技或交通建設。這個預測模型對於美國未來十五年經濟成長率的假設現在看來還過於樂觀，也就是說除非美國能夠採取激進手段壓制健保支出的增長，否則美國幾乎無法避免財政崩潰的結局。

第二是美國政治體制的嚴重失靈，這個體制已經逐漸失去了為絕大多數民眾謀求福祉的最基本功能。美國憲政的設計原理是刻意讓由多數民意產生的政府受到多重的權力制衡，讓代表少數民意的政治力量有多重機會行使否決權。這樣一種制度設計，講求的是協商手腕與妥協精神。如果社會的主流價值十分趨同，主要政黨之間的意識形態差距很小，還可以維持平順運作；如果社會內部出現嚴重的價值分歧，主要政黨的基本立場南轅北轍，這個體制很容易陷入僵局。

從雷根時代開始，新保守主義在美國社會意識形態領域取得主導地位，並在美國社會掀起前所未有的價值衝突與對立，共和黨完全由鼓吹「政府無用、市場萬能」的極右派所主導，共和黨、民主黨的政治妥協空間日益壓縮，社會兩極對立日益嚴重。如果美國基本上仍處於國力鼎盛、經濟健康、社會昌平的時期，政治僵局還不至於帶來嚴重後果。可是，今日美國正處於由盛轉衰的歷史關頭，美國經濟正滑向長期衰退的深淵，美國政府債信危機蓄勢待發，社會貧富差距日益懸殊，地方政府財政枯竭，基礎建設更是普遍年久失修。政治僵局將讓美國社會失去方向與動力，也錯過扭轉頹勢的黃金時機。

8 Niall Ferguson, "A Greek crisis is coming to America," *Financial Times*, Thursday, Feb. 11, 2010.

9 Interview David Walker, <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tentrillion/interviews/walker.html>.

美國財政赤字失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國的醫療總支出高出西歐國家一倍以上，幾乎是多數東亞國家三倍左右，但是在當前美國政治體制下，大幅壓制健保支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為與醫療有關的產業早已超越傳統的軍工產業與石油能源產業，能與華爾街等量齊觀，成為政壇上呼風喚雨的超級利益集團，可以在國會阻擋任何妨礙其利益的體制改革。最不可思議的是，仍有眾多的美國民眾仍然深信美國的醫療體制是全世界最好的，對於任何強化政府管制成本與限制市場定價的改革都心存懷疑，這種根深蒂固的偏見讓茶黨有很大的動員能力，也讓歐巴馬的醫療改革計畫受到嚴重折損。

第三是美國的軟實力在過去十幾年受到嚴重折損。小布希政府的單邊主義，獨斷獨行，讓美國在全球領導地位的道德基礎受到嚴重的打擊，美國更倚賴軍事投射力量或先發制人手段來壓制對手。美國對俄羅斯和中國的安全圍堵，也使它陷入了 Paul Kennedy 與 Chalmers Johnson 所說的「帝國過度擴張」(imperial overreach)¹⁰ 陷阱。美國在單極體系下不斷的試圖擴張海外軍事基地，試圖支配所有地區的安全結構與秩序，並試圖對於它未來所有可能潛在的對手做嚴密的圍堵防範，當然也讓它備多力分，到一個臨界點就出現捉襟見肘。歐巴馬上臺之後，雖然試圖修正小布希的單邊主義路線，並開始從伊拉克撤軍，重新將焦點移到亞洲，但世界戰略格局已經出現根本性的變化。

同時，長期以來美國一直以雙重標準來處理國際經濟秩序。美國要求其他國家遵守自由貿易規範，但經常片面立法違反 WTO 規章（例如 301 條款）。美國透過 IMF 要求其他國

家維持財政紀律與長期國際收支平衡，但自己卻未能遵守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應有的財政紀律與宏觀經濟均衡，相反的美國經常為了稀釋債務或支付國外軍事行動，而濫用其鑄幣特權，讓美元在全球氾濫成災。尤其，最近十年美國渙散的金融監管與鬆弛的財政紀律，讓美元幣值信用與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成為威脅全球經濟體系的不定時炸彈。

再者，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秩序是以一種極端的經濟自由主義為核心思想，學者稱之為「華盛頓共識」。根據這種極端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建立的市場遊戲規則導致「貧者越貧、富者越富」，而且讓弱勢群體暴露在高度的經濟風險之下，因此在過去十年「華盛頓共識」開始退潮，世界各地都出現反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社會運動。尤其在拉丁美洲左翼政治勢力一一興起，對於美國主導的美洲自由貿易區計畫進行抵制。紐約「外交協會」在 2008 年發表一篇政策分析報告，這篇針對美國與拉丁美洲關係的報告，由 Charlene Barshefsky 與 James T. Hill 主持，報告的結論是「美國在拉丁美洲的霸權已經告終」。同年年底第一屆拉美與加勒比海國家首腦會議在巴西舉行，有三十六個國家參加，這次會議跟以往所有拉丁美洲首腦會議最大的不同是，美國沒有被邀請，古巴被邀請了。這是拉丁美洲向「門羅主義」挑戰的一個起點。拉丁美洲已經開始尋求掙脫美國在西半球的獨霸，而這是美國的后院，清晰的說明美國單極體系的頹勢。

意識形態場域的多元化

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意義是十分深遠的。這意謂著「一元現代性」(singular modernity) 的歷史框架鬆動了，取而

10 Chalmers Johnson, *Blowback: 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Empire* (New York: Henry Holt & Co., 2004).

代之的是「多元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的格局，¹¹ 過去在一元現代性框架下，衡量「進步」與「落後」的座標是明確的，現在這個我們熟悉的歷史座標開始受到質疑。這也意謂著，非西方社會在面對社會制度與價值體系之選擇時，享有更大的思維的想像空間，與西方文明接軌未必是「進步」，與自己文化傳承重新接軌未必是「落伍」，非西方世界更有條件開展費孝通所提倡的「文化自覺」，¹² 因為西方世界加諸於非西方世界的意識形態制約條件將越來越缺乏說服力。這跟冷戰結束後的頭十年完全不同，在當時所有非西方社會都面臨「選項的壓縮」(narrowing of options)的困境，選舉式民主與美國式資本主義，似乎是唯一的道路。

當時這種預期是建立在二十世紀最後四分之一世紀所發生的劇烈的、席捲全球的社會、經濟與政治變化。這個變化的主軸是民主化與市場化。當時西方一些志得意滿的知識分子甚至預言，人類正走向歷史演進的終點，也是文明的極致——即人類最後的、最高的社會體制，不存在超越這種體制的其他可能性，而尚未出現這種體制的社會，也無可避免的要向它靠攏與接近。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的《歷史終結與最後的人》一書中曾大膽的斷言：自由主義的民主，構成了人類意識形態演化的終點，也是人類政府的終極型式，沒有其他體制可能超越西方的自由民主體制。¹³ 在這種視野框架之下，西方知識分子有這樣一種假設：民主可以帶來和平，民主可以帶來良治；經濟自由化與全球化可以帶來持續發展與共同富裕；人類社會可以享受美國盛世下的太平(Pax Americana)，全世界也會心平氣和地接

納美國的領導，因為美國是打造世界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的龍頭。

接下來的發展，與當時的樂觀預期幾乎是南轅北轍。「歷史終結論」今日回頭來看是十分膚淺，連福山自己都不敢再提。在二十一世紀的開端，美國盛世下的「天下不太平」的徵兆已經昭然若現：首先，美國的民主本身逐漸陷入體制運作失靈危機，而許多新興民主國家紛紛湧現嚴峻的治理危機、政治亂象叢生，甚至民不聊生。在全球各個角落，市場萬能、自由化萬靈的神話開始在消退。經濟全球化在世界各地遭遇勞工、農民、環保團體，以及其他經濟弱勢群體的強烈反彈。極度異常的氣候與巨型天然災害頻頻爆發，讓許多第三世界最弱勢的群體飽嚙流離失所的痛苦，也讓全球糧食安全亮起了警訊。美國在伊拉克所點燃的中東戰火，只是讓這個原本已經不平靜的世界，顯得更為荒謬與血腥。美國金融體系的腐敗與潰爛，更讓美國鼓吹的市場萬能的神話徹底破滅。

民主與市場的神話開始褪色，因為「民主」與「市場」，這兩個被很多政治領袖與知識分子定義為架構二十一世紀人類社會生活的兩大支柱，遭遇嚴重的變形與退化。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民主與市場之實際運作不但未能達到人民之期許；兩者反而成為二十一世紀世界秩序動盪的來源。扭曲市場與民主的根本力量，是美國過去三十年來打造的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這個新秩序讓美國式資本主義所向無敵，讓跨國資本在全球範圍取得前所未有的主宰地位，民主與市場兩者都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的俘虜。全球資本主義使得極少數跨國企業精英取得影響國家政策、支配社會基本遊戲規

11 S. E. Eisenstadt, "Multiple Modernities," *Daedalus*, 129, 1 (Winter 2001), pp. 1-29.

12 費孝通：〈從反思到文化自覺和交流〉，《讀書》，1998年第11期（1998年）。

13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3).

則的無比權力。金融全球化，使得資本可以自由流動到任何一個給他們最大優惠的地方，讓資本家不再需要遷就其他階級的基本需求與政治權利。美式資本主義解體了許多國家的社會凝聚力，衝擊了歐洲國家許多調和民主與資本主義的基本設計，例如福利國家與勞工權利保障。全球資本主義宰制下的民主向資本家利益嚴重傾斜，並導致國家機構經社職能減縮與維護公共福祉能力的退化。不僅如此，全球資本主義宰制下的市場機制，誘導與鼓勵無止境的享樂與無節制的貪婪，對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更帶來嚴重的破壞、巨大的風險。

在美國社會意識形態領域取得主導地位的新保守主義，試圖將這種圍繞全球資本主義邏輯運作的「變形民主」與「變形市場」移植到全世界，並試圖將這種賦予跨國資本無上權力的宰制結構永久化。美國的民主本身，就成為這場新保守主義革命的受害者，社會兩極對立日益嚴重、民主程序遭遇扭曲、勞工與中產階級的政治影響力被大幅壓縮。過去三十年，美國民主所隱含的階級偏差已經積重難返。最近，美國加州大學皮爾森（Paul Pierson）教授與耶魯大學哈克爾（Jacob Hacker）教授在《勝者全拿的政治：華府如何讓富者更富並背離中產階級》一書中深刻的論證了美國社會「富者更富、中產趨貧、貧者更貧」大趨勢。導致社會財富高度集中於極少數群體很大一部分是由於：最富裕階層操控政治的能力不斷上升，透過利益遊說、金權政治與操控媒體，他們主導了社會基本遊戲規則的重新制訂，並將過去維護中產階級的租稅體制、管制規則、保

障體制逐一侵蝕，讓美國民主逐步淪為「富豪政治」（plutocracy）。¹⁴

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第格利茲（Joseph Stiglitz）所形容的，美國民主已經早已背離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實質上美國民主已經變形為「百分之一所有，百分之一所治、百分之一所享」。¹⁵ 過去經常給開發中國家開經濟處方的知名經濟學家傑佛瑞薩克斯（Jeffrey Sachs）最近也沉痛的指出：「美國政客已淪為企業的傀儡，而廣大選民則被漫天的廣告包圍和催眠。」¹⁶

美國民主政治的退化具有感染性，甚至成為全球民主品質退化的最大感染源。這對所有新興民主國家而言，都是一個巨大的陷阱。因為，一方面在意識形態領域西方式民主依然被樹立為普世價值，或是唯一的選項（the only game in town）；另一方面美國的這種「變形民主」又被普遍模仿，而且在模仿過程中經常是變本加厲，其結果是讓多數新興民主國家陷入劣質民主的困境。因為，如果劣質民主的源頭仍在進行錯誤示範，其他國家的民主體制更難產生自我矯正的改革動能，人民只能逆來順受民主包裝下的惡質政治，因為似乎民主無可替代。

許多第三波民主國家，從東歐到拉美，許多民選政治人物為拉選票，挑動選民的情緒，掩飾執政的缺失，刻意操弄認同、宗教與族群議題，製造仇恨、兩極對立與社會裂解，甚至引發種族暴動與內戰。而且在許多新興民主國家，爭奪執政地位與維護黨派利益壓倒一切，憲法的權威遭到踐踏，選舉過程遭到扭曲，司

14 Jacob Hacker and Paul Pierson, *Winner-Take-All Politics: How Washington Made the Rich Richer—and Turned Its Back on the Middle Clas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0).

15 Joseph E. Stiglitz, "Inequality: 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 *Vanity Fair* (May, 2011). Accessible at: <http://www.vanityfair.com/society/features/2011/05/top-one-percent-201105>.

16 Jeffrey Sachs, *The Price of Civilization: Reawakening American Virtue and Prosperi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1).

法不能解決淪為政治鬥爭工具，政權變成職位分贓體系，貪汙腐化橫行。此外，大多數新興民主國家的現代國家建設（modern state-building）過程不充分，官僚體系缺乏治理能力和獨立性，軍隊與司法也無法超越黨派，所以不具備做一個法治國家的條件。在國家機能不健全的情況下推行民主，就像在一個地基不穩的基礎上蓋房子。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黨派間的惡性競爭，更加削弱國家機構的治理機能、獨立性與公平性，剝奪了人民享有良好治理的可能性。

《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的主編 Larry Diamond，在 2008 年 *Foreign Affairs* 發表的文章，首度提出全球進入民主蕭條期（democratic recession）的警告。他認為在很多新興民主國家，民主政治正處於不進則退的狀態，民主越來越退化為一種表象，人民必須忍受各種形態的劣質治理，許多國家的司法機構與軍隊濫權，很多寡頭精英透過民主程序完成權力的獨佔，這些偏離民主法治常態的嚴重缺失非常普遍。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可能還勉強維持民主的門面，但民主的內涵很大程度上已經被腐蝕或掏空。這種現象在很多第三世界新興民主國家很普遍。¹⁷

如果挖的更深一點，Larry Diamond 所談的這些現象，實際上還忽略掉了「第三波民主」的兩個結構性障礙。第一道結構性障礙是，美國作為推動民主的唯一超強，卻不能提供一個良好治理民主的示範。而且美國本身也干預其他國家的政治，美國在干預的過程中，當然有的時候是從人權民主的角度，更多的時候是從戰略利益出發，也就是說基本上是扶持親美的而打擊反美的政治力量。在這個過程裡面，親美政權就算是做票贏得選舉，美國也會

縱容它；反美的力量即使真正符合民意的需求上臺，美國也會制裁它，甚至試圖推翻它。這樣美國就不可能幫助這些國家的民主走上正軌。而且很多中小型的國家都面臨這樣一個困境，也就是說多黨競爭反而提供外來強權一種干預機會。也因為國內的競爭團體各自有後臺老闆，他們也更不願意進行妥協，所以他們的鬥爭更加劇而且會深化社會內部的分裂。這是大時代的環境所造成的民主困境。

第二個結構性障礙是第三波民主被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所綁架的。市場化與民主化結合成一個連體嬰兒。徹底市場化、徹底私有化、徹底自由化讓廣大的經濟弱勢群體不可能透過民主真正改變他們的不對等的經濟地位，反而他們無法阻止自己經濟地位的下滑、無法制止富裕與特權階層的巧取豪奪。九十年代的民主化是伴隨著市場體制改革而來。經濟與政治是自由秩序的一體之兩面。在經濟層面，出現了很多令人感嘆的現象。俄羅斯的「市場改革」，在九十年代導致少數人鯨吞全民資產，進行歷史上罕見的大規模財富重新分配，至少有四千億美金的資金遭席捲到國外。這些攫取國有資產的大亨，用低廉的價格把資產賣給跨國企業，現金則透過地下管道拼命移往海外。在英國，不少上億美金的古堡豪宅、甚至連英國的職業足球隊，也被俄羅斯大亨買走。這些逃亡海外的資金，是全體俄羅斯人民幾十年來辛勤勞動的結果。從社會層面來看，俄羅斯的「市場改革」，把俄羅斯打回到幾乎比第三世界國家還落後的狀態。由於醫療保障體系崩解，再加上俄羅斯中年人大量失業以及酗酒，男人的平均壽命劇降十歲，仿佛回到二次世界大戰。這是俄羅斯人重新渴望強人政治與恢復戰略產業國有化的歷史背景，也是「普丁現象」出現的根源。

17 Larry Diamond, "The Democratic Rollback: The Resurgence of the Predatory State,"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2 (March/April, 2008), pp. 36-48.

在全球資本主義的宰制下，民主日漸成為一個空殼子，既無法維護公民的福祉，也無力回應公民的需求。今日我們所熟悉的「民主」，只是一個以「國家」為範疇的政治體制，而全球資本主義體制下的主要權力行使者，卻可以跳脫任何單一「國家」的管轄與節制。而今日對我們的生活方式、經濟安全、社會秩序、環境品質可以產生巨大影響力的決策者，往往不是民主程序產生的政府，而是一些幾乎完全不受民主機制監督的跨國權力行使主體，例如跨國企業集團、跨國媒體集團、資訊科技王國、華爾街投資銀行、避險基金、信用評等機構、大會計公司、國際貨幣基金、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全球化的資本主義，顛覆了國家層級的民主體制的基本目的與職能，經濟全球化一步步掏空「國家機構」，讓國家層次的民主政體，成為經濟巨人陰影下的政治侏儒。¹⁸

歐洲國家早已面臨這樣的困境，所以試圖在更大的範圍進行政策協調，推進經濟與社會立法的統一，以及貨幣政策的整合，但是由於各國仍相當程度保有獨立主權、各自為政的財政體制與銀行監管體制，歐洲各國並無法掙脫全球資本主義的束縛與侵蝕，各國政府所能做的，就是儘可能協助弱勢團體抵禦全球化的社會風險，延緩中產階級貧窮化現象的蔓延，但沒有真正有效的對策。歐洲的跨國企業與金融機構紛紛模仿美國式資本主義的營利模式，以短期股價表現為唯一績效指標，而背離對自己的員工與社區的義務。

更由於政黨體制的中介功能逐漸萎縮，在大眾媒體與網路媒體發達的時代，政治人物憑藉民粹訴求與媒體操作就可以騙取選票，這導

致民選政治人物的決策都傾向短期操作，為了眼前的政治利益與可分配資源極大化，他們都選擇向未來透支，將痛苦的決策隱藏或不斷延後，逕相濫開選舉支票，其結果必然導致財政結構迅速惡化或外債高築。多數選民總是喜歡政客給他們灌迷湯，選民不喜歡聽到壞消息，政客也不敢引導選民面對真相，直到問題日積月累，危機一發不可收拾為止。這種選民的短視與政客的投機傾向，即使在成熟的民主國家也很難避免，這是希臘、葡萄牙、愛爾蘭、西班牙、義大利——爆發國債危機的原因之一。

這次起源於美國的金融危機，讓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思想面臨破產；歐洲陷入二次大戰以來前所未見的經濟困境，也讓西方引以為傲的代議民主蒙上陰影。世代正義與福利國家間的尖銳衝突正支解大多數歐洲社會的內部共識，歐洲年輕世代面對的是一個沒有希望的未來，這勢必將成為社會動亂與偏激政治路線的滋生溫床，頗讓人擔心 1930 年政治動亂的歷史重演。這也意謂著，西方社會正從非西方世界知識分子景仰的目標逐漸轉換為反思的對象。第一個面臨嚴格檢視的對象就是新自由主義模式。這個流行了三十年的模式強調小政府、取消管制、徹底私有化和低稅收，現在這個模式已經走到歷史盡頭，非西方國家社會精英必須重新思考如何在市場經濟、政府角色、社會正義以及永續發展四者之間找到均衡點。同樣的，西方引以為傲的民主體制也遲早會成為反思的對象。¹⁹ 非西方國家社會精英也必須重新思考如何讓民主參與機制能真正確保良好治理與增進社會福祉，如何不讓「民治」與「民享」脫鉤。

18 更完整的論述，請見朱雲漢：〈對民主與市場的反思：一個政治學者在二十一世紀開端的沉痛思考〉，《思想》第 3 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6 年），頁 75-92。

19 Nancy Birdsall and Francis Fukuyama,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Development After the Crisis,"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2 (March/April, 2011), pp. 45-53.

面對這些二十一世紀人類社會出路的根本問題，西方知識界普遍缺乏創新與超越的思維，這是因為西方知識分子無法跳脫出「西方中心」的世界觀，無法心平氣和的去理解與欣賞非西方文明的豐富歷史經驗。如果問到西方學者，那些陷入劣質民主的國家（例如菲律賓）如何才能掙脫惡質政治的困境，天真的西方學者只能給出「民主的弊病要靠更多的民主來治」或是「要大力發展市民社會」或是「要先強化法治」等答案。但是任何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都知道，將這種教科書的制式答案放在那些民主體制嚴重失靈國家的現實條件下，是沒有實質意義的，所以最多只是一種搪塞敷衍之詞。²⁰ 這種思想上的蒼白，正好顯示出西方知識界的封閉與貧乏。在西方思想界裡，共產主義早已被宣告破產，經濟民主思想塵封已久，民主社會主義也失去與時俱進的活力，自由民主又被全球資本主義綁架，社群主義被侷限在象牙塔裡不具社會實踐能量，²¹ 所謂「第三條道路」（The Third Way）又缺乏成功的範例，²² 西方批判思維只剩下反理性的相對主義與缺乏行動綱領的溝通理論，這是當下西方知識界最大的悲哀。這也是為何「佔領華爾街」運動可以發出悲憤的怒吼，但卻提不出改造西方社會體制的思路與對策。

在這層意義上，中國發展模式的突出表現，震驚了西方主流經濟學，也撼動了國際發展機構對於經濟發展與經濟治理的話語權，讓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在思考如何在社會公正、可持續性發展以及自由市場競爭效率之間取得平衡，有一個更寬闊的思考與選擇空間。中國的發展經驗幾乎打破所有西方經濟學教科書的定律，尤其在全球遭逢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之

際，中國所特有的計畫經濟與市場經濟混合體制，在抵禦金融海嘯的致命性破壞力上，以及穩定市場參與者的投資與消費信心上，特別能彰顯其應付外部風險的優勢。過去，中國大陸領導者一直堅持經濟體制改革有底線，戰略性經濟部門將長期維持國有。這個底線曾經是許多自由派經濟學家詬病的對象，也不斷被西方媒體嘲弄為落伍的計畫經濟遺跡。但是在金融海嘯的肆虐下，中國政府因為直接掌控壟斷性資本密集產業與大型金融機構，要比歐美國家政府更有能力防止國內投資規模與信用市場流動性的急遽萎縮。

中國政治模式的實踐經驗也十分突出，在引導社會追求最佳公共選擇上有其明顯的功效。過去，西方的觀察家根據自己的政治經驗，很難理解一個政治體制不具備「民治」的程序，卻有可能達成「民享」的實質結果。但是他們面對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三十年所達成的具體成果，共產黨政權在處理汶川地震災難、應付全球金融海嘯等重大挑戰時展現的統籌兼顧的能力，的確令西方國家政府難以望其項背。因此，最近幾年有西方觀察家開始承認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也有局部的優越性。

例如，不久之前《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利曼（Thomas Friedman）在他的新書裡，有一章的標題是〈讓我們做一天中國〉（Let's be China for a day）。他在這章裡談到跟通用電器（GE）公司執行長 Jeffrey Immelt 的對談，Immelt 談了很多關於下一任美國總統，應該推動哪些立法、採取哪些措施，來引導美國社會節能減碳，以及擺脫對進口石油的倚賴。弗利曼聽他講完這些理想的方案後，很坦白對

20 朱雲漢：〈東亞民主困境與當代思維陷阱〉，《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65 期（2007 年 3 月），頁 249-256。

21 社群主義與中國傳統王道思想有互動之處，但在歐美知識界是非主流，對實際政治更缺乏影響力，在美國只有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 Amitai Etzioni 教授試圖設立 The Communitarian Network 網路通訊站向知識界推廣。

22 Bill Jordan, *Why the Third Way Failed: Economics, Moralit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Big Society"* (Bristol; Portland, OR: Policy Press, 2010).

Immelt 說，你的這些構想我都很贊成，但這些東西在美國現有的政治體制中都做不到，因為美國的利益團體的遊說政治一定會否決你這些政策。除非「讓我們做一天中國」才有可能一步到位，把這些理想中的法律與政策在一天內搞定，然後第二天開始又恢復美國的體制。²³當然，這是弗利曼是半認真半開玩笑的話，但是透露出，他承認中國的政治體制比美國體制更有可能達成「社會最佳選擇」。

現在有少數有反省能力的西方學者，也感覺到必須重新檢討「民主」與「非民主」政體的傳統二分法，應該用廣義的「有效政治秩序」與「良好治理」指標，以及用能否有效達成「社會最佳選擇」作為判準，來比較各種政體的表現以及正當性基礎。²⁴當我們使用這些本質性的指標來比較不同政治模式的優劣時，我們才會對於政治體制的「程序」、「能力」與「結果」三者予以同等的重視。²⁵從寬廣的歷史角度，多種政治體制的並存與相互競爭，對於人類文明可以產生推進力量。如果西方代議民主確實變成唯一的選項，在很多開發中國家，人民恐怕只能長期忍受或遷就品質低落的代議民主，因為其他道路都被堵死。

整體而言，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將加速一元現代性框架的式微，加速多元現代性框架的確立。未來，西方歷史經驗將不再是唯一的參考架構，也不能用簡單的形式化指標來界定文明的「先進」與「落後」。在多元秩序格局的世界裡沒有先驗的「普世價值」，任何制度

與價值體系都必須在不同的社會土壤、不同歷史條件下經過實踐的檢驗，經過時間的淬鍊才能取得其特定時空下的正當性。在未來非西方社會在面對社會制度與價值體系選擇時，將享有更大的自主的思維與想像空間，也有機會擺脫「西方中心」的世界觀，也會開始意識到有必要重新聯結自己文化傳統中值得保存與發揚的理念與價值觀，並從更包容與多元的角度理解不同文明體系的內涵與特質。

全球治理機制的變革

最近在華府引發巨大迴響的一本警世之作，是由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學者阿文德·薩博拉曼尼亞（Arvind Subramanian）在今年九月出版的新書《日蝕：生活在中國經濟主導地位的陰影下》。²⁶這本書以一個噩夢的場景揭開序幕：「2021年的某一天，美國總統跑去距離白宮不遠的國際貨幣基金，簽署一份與該組織的中國籍總裁商討達成的救助貸款一攬子協定。」這本書在華府引發熱烈的討論，因為他所描繪的美國噩夢已經不是杞人憂天的幻想，而是可以想像的模擬情境。

Subramanian 所擔憂的，也是加州柏克萊大學國際研究中心主任偉伯（Steven Weber）與另外兩位年輕同事所擔憂的，他們早在 2007 年就開始提出「沒有西方的世界」（A World Without the West）的課題，他們想要回答在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之後，對全球秩序將會帶來什麼樣的改變？現有的全球治理機制可能被迫

23 Thomas Friedman, *Hot, Flat, and Crowded: Why We Need a Green Revolution—and How It Can Renew Americ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8).

24 例如福山的近作，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25 可以參考最近福山與張維為的對話，參見 "The China Model: A Dialogue between Francis Fukuyama and Zhang Weiwei,"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Vol. 28, Issue 4 (Fall 2011), pp. 40-67. Article first published online: 16 Nov. 2011 and accessible at: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1540-5842.2011.01287.x/abstract>.

26 Arvind Subramanian, *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1)

做出何種調整。²⁷ 他們憂慮非西方世界會根據不同的世界觀與價值觀另外建構一套國際交往的規則，然後把西方國家建構的國際規範擺在一邊。他們也擔心混亂與衝突將由此而生，甚至擔心人類文明因此倒退，這種憂慮本身還是西方中心思維下的一種自然反射。

多數現存的全球治理機制都是由西方國家長期把持的，這些規範與制度安排都是根據西方國家的理念所建構的，其本質是維護西方核心利益與主導地位。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過去六十年來世界銀行總裁一向由美國指定，IMF 總裁一向由歐洲人出任的不成文慣例。西方國家在面對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時，一方面試圖以既有的體制來引導與吸納新興經濟體，一方面儘可能維持自己的主導地位不受動搖。但他們也意識到，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現存全球秩序很難不受衝擊，全球治理機制也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2008 年金融危機之後，西方國家不得不接納非西方大國參與全球經濟管理，因為此時西方國家陷入最險惡的金融危機，必須依賴新興國家的儲蓄來挽救財政危機，必須仰賴新興國家的投資與消費帶動世界經濟復甦。

所以在 2009 年 G20 倫敦高峰會上，G20 的地位正式獲得確認，在功能上 G20 取代了過去富國俱樂部 G8 的角色，立刻成為最重要的全球議題定期協商機制。在倫敦 G20 會議上，美國與西歐也同意啟動國際貨幣基金（IMF）改革計畫，一方面大幅增加可貸資金規模，同時重新安排 IMF 投票權，讓金磚四國取得更大的份額，四國的投票權比例總和可以超過 15%。西方國家也首度表示，願意就 IMF 的宗旨與任務、決策機制、經濟治理哲學以及最高層人事的改革進行探討。不過，到目前為止，美國仍不願意放棄她的否決權（也就是讓自己的投票

權從 17%降低到 15%以下），歐洲也仍未準備放棄對於 IMF 高層人事的獨佔。

在面對西方國家建構的全球秩序以及相應的全球治理機制時，未來非西方國家的社會精英無可迴避的兩個核心問題是：

第一，西方國家所建構的秩序與制度，及其背後的核心理念，是否公正？是否合理？是否可持續？

第二，非西方國家是否能提出一套新的理念以及具體主張，能更合理、更公平、更有效的處理全球治理與人類永續發展課題？

對於第一個問題，其答案已經呼之欲出。當前西方國家所建構的秩序與制度，並不公正，也不合理，無法真正回應地球上七十億人的生存與發展需求，在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後也必然無法持續。對於第二個問題，其答案仍然晦澀不明，因為非西方世界的知識精英還沒有做好思想準備。非西方國家的知識精英過去對整個世界的理解，對於全球事務應該遵循什麼樣的秩序與規則來進行管理，不自覺的會陷入西方中心的窠臼，一旦西方中心思維正逐漸被質疑或被迫調整的時候，接下來可能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還沒有全盤的思路。

當前全球秩序的基本內涵是美國支配的霸權體系與西歐推動的法治體系的混合體，這個混合體本身充滿著矛盾與偽善，因為美國的霸權體制與法治體系是高度不相容的，所以在安全事務領域美國依然獨行獨霸，她可以掌控安理會時就打著聯合國的旗號進行經濟制裁或軍事干預，安理會不順其意志時就自行組織制裁或干預同盟，把聯合國徹底架空。西歐國家領袖經常對開發中國家維持死刑問題指指點點，但對於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帶來六十萬無辜平

27 Naazneen Barma, Ely Ratner and Steven Weber, "A World without the West," *National Interest*, No. 90 (July/August, 2007), pp. 23-30.

民死亡的慘劇卻視若無睹。當前全球有十億人口處於饑饉邊緣，美國有四千萬人在貧困線下掙扎，可是美國佔領伊拉克一個月的花費是 40 億美金，佔領阿富汗一個月的花費是 19 億美金，過去三年美國政府救援金融體系的花費至少 2.3 兆美金。

這個以西方個人主義理念為基礎，以西方富裕階層利益為核心的全球秩序正面臨重大難題與危機。在這個秩序之下「天下很不平」，宗教、文明與族群衝突不斷；威脅人類社會的毀滅性武器仍然在增長與擴散；全球環境與生態失衡的危機在持續惡化，能源、糧食與水資源的爭奪成為國際衝突的新焦點。全球經濟結構失衡越來越嚴重，世界經濟也缺乏穩定的全球貨幣，金融危機不但頻頻爆發，而且對實體經濟的摧毀力量愈來愈可怕。

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秩序自由化，讓美國式資本主義擴散全球，導致所有國家社會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無論在每一個國家或全球範圍之內，全球化的利益與風險之分配極度不均，貧富差距、知識與數位落差不斷擴大、弱勢群體被不斷邊緣化並暴露在巨大的經濟與環境風險下，富豪階層與跨國企業擁有制訂社會遊戲規則的最終權力，主權國家的利益協調與保護職能日益空洞化。美國在過去三十年一手打造的金融全球化，讓每一個國家都開放資本市場，然後讓跨國金融資本快速自由流動興風作浪，更讓各種所謂「金融創新」工具無止境的加以擴充。在很短時間內全球金融市場創造的虛擬經濟快速增長達到一種難以想像的規模，過去十年內每年全球金融商品交易總量將近全球 GDP 的 35 倍到 50 倍，在這個過程中資產泡沫不斷膨脹。金融投機創造紙面財富的速度遠超過從事生產的實體經濟。投資銀行與避險基金的信用極度擴張，以有限的資本從事幾十倍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構成綁架全球實體經濟的定時炸彈。在這超級規模的大賭場

裡面，所有國家的命脈，企業的生存，社會的枯榮、百姓的安危都成為投機家的賭本。

建構這個全球金融遊戲規則的幕後推手就是華爾街，因為華爾街可以操控美國財政部，而美國財政部又可以操控國際貨幣基金，國際貨幣基金不但掌控迫使許多國家就範的救援工具，更掌握金融政策思想的話語權，可以輕易打開各國的資本市場與金融管制大門。這個由高槓桿所撐起的虛擬經濟活動對於實體經濟活動構成嚴重的威脅，當資產破滅時所有金融機構與避險基金都被迫進行去槓桿化 (de-leveraging)，必然產生巨大的金融摧毀力量。所以過去三十年美國主導的金融全球化，等於在縱容華爾街巨鱷在全球範圍經營「老鼠會」經濟 (Ponzi economy)，其滋生的暴利早已透過分紅落入金融資本家口袋，而泡沫破裂後的巨大社會成本卻由所有納稅人以及所有參與實體經濟的人買單。

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美國聯準會陸續推出定量寬鬆政策，更形同無限制的向金融體系灌注美元，頓時讓美元淪為「劣幣」。這些新增的流動貨幣紛紛溢出美國國境，讓全球金融體系都變成巨大的印鈔機構，尤其是設法讓本國貨幣釘住美元的亞洲國家，被迫將美聯準會的超級寬鬆貨幣政策加以放大。各國中央銀行大量發行本地貨幣買進美元來限制匯率的升值幅度，其結果是助長資產價格泡沫，以及全球性通貨膨脹。這一波由美元氾濫引發的全球性通貨膨脹，等於是對世界各地絕大多數家庭辛苦積累的銀行儲蓄進行無情的價值摧毀，讓他們的實質財富大幅縮水。最近糧食與能源價格的飆漲，更讓開發中國家中許多低收入民眾陷入飢寒交迫，在北非、中東與南亞甚至引發社會暴動與政權倒臺。所以美國主導的全球貨幣金融體制已經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開發中國家已經普遍意識到這個體制不但不公平、不合理，更不穩定。

王道思想與全球秩序重組

對於當前全球秩序與治理機制的公正、不合理與不可持續的基本缺失，非西方國家的知識精英以及少數具有正義感的西方知識分子已經有所覺悟，並且觸發許多反思與改革的提議。

例如，開發中國家領袖終於覺醒到，在全球暖化與溫室氣體排放問題上，他們必須建構自主的「全球碳正義」話語權，不能再讓西方國家主導全球氣候變遷公約。在 2008 年哥本哈根會議上，在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等「基礎四國」（BASIC）的領導下，開發中國家整合了七十七國集團代表的意見，提出了「哥本哈根協議」草案，來對抗英國、美國與丹麥等國代表祕密草擬的「丹麥文本」（Danish text），讓西方國家利用重新分配溫室氣體排放壓縮開發中國家成長空間的密謀功敗垂成。

又例如 2009 年聯合國大會成立的「國際貨幣及金融體系改革委員會」，提出了一系列相當激進的改革建議。這個委員會的專家小組主席是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第格利茲（Joseph Stiglitz）出任，他一向認為 IMF 過去在處理亞洲金融危機時嚴重失職，這才導致亞洲國家在過去十年間大量囤積外匯，並加速了全球經濟的結構性失衡。史第格利茲主張，中國與其他新興經濟體未必需要積極回應歐美所提 IMF 增資的要求，他們應該考慮在 IMF 架構外成立一個新的國際貨幣儲備體系。在此之前，他們可以先擴大區域性的貨幣基金，例如「清邁協定」所倡導建立的亞洲區域外匯儲備基金，或是由委內瑞拉等七個南美洲國家組成的「拉丁美洲外匯儲備基金」（FLAR），讓

這些區域性機制扮演短期融資與穩定區域金融的功能。²⁸ 這些大膽的提議現在紛紛出籠，因為許多國家都意識到，美國已經不再是一個負責任的全球經濟管理者，必須建立一套新的機制來限制美國濫用其鑄幣特權。

今年 4 月份在三亞舉行的「金磚五國高峰會」更為重新塑造二十一世紀的全球治理體制揭開了序幕。在這次會議上，金磚五國的領袖公開宣示將攜手所有發展中國家，建立一個更公正、更民主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金磚五國的領導人特別將他們的矛頭指向濫用其全球鑄幣權的美國，而提出建設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中的發言權和代表性，推動本國貨幣結算貿易等主張。這意謂著他們決心要撼動美元的霸權地位。

在思維層次，非西方世界知識分子已經意識到，他們的發展道路不能重蹈西方物質文明的覆轍，因為地球無法承擔，廣大非西方世界必須另闢蹊徑。尤其是中國與印度的知識精英更是責無旁貸，因為他們的人口和經濟規模讓他們經濟崛起對地球生態平衡的潛在衝擊將遠大於西方先進工業化國家遺留的歷史包袱，因此中國與印度根本無法迴避自己的發展模式對全球帶來的潛在負面外部性問題。

也有學者意識到，國家層次的民主治理已經不能適應人類發展的需要，亟需在全球層次建立新的民主治理機制，讓所有利害與共的群體都有機會參與全球事物的管理、才能徹底控制資本主義的風險與破壞性、才能有效駕馭全球資本主義的兩極分化傾向、才能全面建構市場與社會、文化、環境共生的規則。也只有用

28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xpert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on Reforms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 September 2009, which is accessible at: http://www.un.org/ga/econcrisissummit/docs/FinalReport_CoE.pdf

全球範圍的民主管理機制，才能改造當前全球權力運作場域的不合理宰制關係，讓主導資訊、知識、意識形態生產的機構回應人類社會最大數人的生存發展需求。²⁹

不過，這些反思與改革提議還未真正觸及當前全球失序與全球治理體制失靈的根源。問題的根源在於建構現存全球秩序的指導理念，這些指導理念在過去造就了西方的富強，也是急於想追趕西方的後起之秀奉為圭臬的指導思想，但這些指導理念卻也是導致人類社會衝突、失序與極度缺乏公平正義的根源。有三個指導思想是西方國家建構當前全球秩序的基礎：一是現實主義，二是自由主義，三是西方中心主義。

西方中心主義相信西方歷史經驗與價值體系的普世性與先進性，但也因為如此西方國家傾向區分我族與異類，歧視與排斥異類文明，人為製造正義與邪惡的對立，並勇於教訓與改造他人，這是導致文明與宗教衝突的根源。

現實主義主張國家利益極大化，突出國際體系利益衝突的本質，主張武力為貫徹國家意志與解決爭議的最後手段，接受強者支配弱者是自然秩序。在現實主義思想指導下，美國建構的霸權體系追求絕對的安全與壓倒性軍備優勢，處處防範潛在威脅者，時時壓制與圍堵潛在挑戰者，甚至主動製造敵人並先發制人，這種思維導致所有主要國家都陷入安全困局（security dilemma）與軍備競賽的惡性循環，無法自拔。

自由主義雖然一方面強調國際社會互利合作的可能性，主張透過規範與制度的建構來化解衝突與引導合作，但另一方面主張個人自由

與利益極大化，並鼓吹民主神話與市場萬能。經濟自由主義思維掩飾資本主義的掠奪與剝削本質，縱容物慾橫流的消費主義，合理化財富兩極化分配。政治自由主義強調人與人、國與國之間形式上的權利平等，但刻意忽視實質上的不對等與不平等。在政治自由主義指導下的民選政治邏輯必然阻礙國際社會的合作。因為民選政治的邏輯必然強化狹隘的國家利益本位思想，也必然引導各國領袖追逐短期目標。最常見的情況是：各掃門前雪、以鄰為壑的主張一定有政治市場；顧全大局、反求諸己的政治主張很難伸張；居安思危、未雨綢繆的主張更是曲高和寡，所以各國政府很難齊心協力來有效處理全球議題，更難真誠合作化解全球經濟危機。

相較之下，中國的王道思想可以為二十一世紀全球秩序的重組提供一套新的指導思維，因為王道思想正好可濟西方核心思想之窮。最近中國大陸社科院哲學所趙汀陽提出的「天下體系」得到了許多知名的歐洲與印度社會思想家與政治哲學家之高度評價。他的理論一針見血的指出，在西方思想中國家已經是最大的政治單位了，世界只是一個空洞的地理空間，然而從國家利益出發不可能看到並定義屬於世界的長久利益、價值和責任，當然也不可能發展出世界的公正秩序。在西方歷史上，帝國模式是其政治思想的極限，然而其核心仍然不過是基於國家理論的「一國統治世界」，是強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結果。³⁰

而在中國有著幾千年傳統的「天下」思想則有著超越國家的維度，表達了關於世界秩序的一種理想。「天下」理論首先要求把世界視為「無外」的整體。假如把世界看作是給定的

29 *Democratizing the Global Economy*, Report issued by th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Globalisation and Regionalisation, University of Warwick, June 2004.

30 趙汀陽：《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

分裂模式（比如西方所習慣的敵／我、國內／國外、信徒／異教徒等基本政治區分），那麼世界的完整性就只能通過征服他者或「普遍化」自己來獲得。而「無外」原則保證了天下的完整性只能依靠內在的多樣性和諧來維持。趙汀陽的理論建構對重新建立中國自己的思想框架和基本觀念，重新創造中國自己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方法論，以及重新思考中國思想文化對於建構世界秩序的意義而言，都是一項重要的嘗試。

傳統的西方思想將國家視為最大的利益共同體，國家之上的規範與制度仍是以國家自願遵守為前提，自由主義又將國家利益化約為個人利益的總和，政治人物必須以討好個別選民為依歸。而王道思想則揭示「無我、無私、無外」原則，主張個人的生存意義在於增進群體的福祉，必須承擔對群體的責任。「天下」為最高的利益共同體，乃是個人最大的關懷對象與最高的道德責任。天下高於國家、國高於家、家高於個人。這與西方的個人主義與國族主義正好形成強烈的對照。

王道思想為個人的道德責任提供明確實踐準則，循序漸進、由內而外，由近而遠，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同時，王道思想也為群體間的互動準則設定三層不同的境界。第一層是先做到「反求諸己」、「推己及人」、「講信修睦」、「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餘力則「濟弱扶傾」、「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最後是以「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為最高的實踐目標。個人根據自己的資材、德行、知識與客觀條件，盡其所能，進退有據、但求無愧。王道思想也強調中道，要執兩用中，不偏不倚，要在本質上有矛盾與衝突的事理中求取平衡，要處理不同層次群體間的利益連結與

協調，既要顧全大局也要照顧個體需求；處理事務要因地制宜、審時度勢、兼容並蓄。這種思維方式，與西方理性主義所習慣的，從少數抽象先驗原則出發，然後針對個案演繹出合理的結論，非常不同。

王道思想所提倡的天下體系與西方國家所建構的現代主權國家體系最大的不同是：王道思想認為國際社會中本來就存在強弱與尊卑間的不對等，對此不能視而不見，反而要正視其道德意涵。因此王道思想強調，對強者、居上位者應該課予更高的道德責任，居上位者要修德文、以大事小、多予少取、濟弱扶傾。反觀西方歷史經驗孕育的主權國家原則早已背離其孕育的西歐歷史情境。在十八世紀的西歐，主張以主權國家作為國際社會的基本單元，彼此平等、相互獨立，有其客觀的合理性，因為西歐國際體系的主要成員在國力上大致等量齊觀。但是當主權國家有強大如美國者，有微小如土瓦魯（人口一萬兩千）者，主權國家原則就成為史丹佛大學 Stephen Krasner 所稱的：「用組織堆砌的虛偽」（organized hypocrisy）。³¹ 虛偽的平等掩飾了強凌弱的真實，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讓強者可以名正言順的追求自我利益極大化，可以己所不欲施於人；可以規避對提攜貧弱者齊頭並進的扶持義務、可以擺脫對維護人類社會共同利益的道德責任。

王道思想倡導局部與全體是有機的聯繫，無法分割；追求局部利益不能危害全體。此外，王道思想認為多元與差異本為自然狀態，不但要包容差異，還要視其為理所當然，「多元一體、和而不同、休戚與共」才是合理的自然秩序。王道思想主張在多元中追求和諧共生，反對刻意壓制差異或打造齊一，異族並非「外者」，而是與我共生的整體的一個部分，

31 Stephen D. Krasner, *Sovereignty: Organized Hypocris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彼此命運相關連。唯有這種觀念才可以化解人類社會的文明與宗教衝突於無形。

結論

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為二十一世紀帶來改造全球秩序與治理機制的契機。不過，非西方社會是否能掌握這個契機則繫於知識精英的文化自覺。非西方社會的知識精英必須認真回顧自己的文化脈絡，以及從多元文化的視野汲取不同文明歷史發展經驗的精髓，來試圖摸索出超越與替代現存的西方中心世界觀與世界秩序。來自非西方社會的知識精英是無法迴避全球社會的公平正義和人類和諧共生議題，尤其是中國與印度的知識社群更是責無旁貸，因為他們的人口和經濟規模讓他們無法迴避自己的發展模式對地球帶來的負面外部性問題。西方傳統的國族體制下國家利益極大化的思考邏輯對中國與印度知識菁英而言是完全不可取的。

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也讓很多第三世界知識分子看得更清楚：西方國家的發展經驗，尤其是西方基於功利主義與個人自由的物質文明，是沒有辦法在全球範圍複製的。全球人類發展的格局、地球脆弱的生態條件都不允許非西方國家複製西方國家的資本累積模式，也不允許他們全盤移植西方物質文明背後的價值體系，尤其是美國的消費主義是不能複製的；因為複製的話，我們需要六個地球，而不是一個地球。中國與印度沒有其他選擇，他們必須尋找一條不同於過去西方國家的發展道路與社會發展模式，他們也不得不提出一套追求超越國家利益極大化邏輯的全球和諧共生思路與治理機制安排，來解決地球上絕大多數人的生存問題，社會公正問題，以及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二十一世紀要比任何過去兩百年的任何時期都更需要創新的規範性國際關係理論，

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為重新塑造現存全球政治經濟秩序創造了必要條件。兩岸政治學者如能善用共享的文化資產，進一步開展王道思想體系的當代意涵，是絕對有機會在規範性國際關係理論領域做出重大貢獻，也有機會為打造一個更合理、更公義的二十一世紀全球秩序做出貢獻。

總之，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意味著，人類社會將同時面臨兩種可能的歷史發展情境，一方面全球秩序可能進入一個較長的崩解與重組時期，在這期間一定程度的失序與混亂很難避免，許多全球層次的公共治理議題可能出現巨大的真空；另一方面，我們也可能迎接一個更公正的全球秩序之來臨。一個更符合對等與互惠原則的國際經濟交換模式，一個更尊重文化與宗教多元性的全球公共論述領域；一個更能統籌兼顧地球上絕大多數群體的可持續性發展需要，以及一個更能體現「休戚與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秩序。

王道文化與二十一世紀大中華的道路⁺

黃俊傑^{*}



引言

在二十一世紀的諸多發展趨勢之中，中國大陸的崛起是最為重要而且關乎全球局勢的大事。在三十年改革開放，經濟突飛猛進的基礎之上，中國大陸在國防、政治與外交的影響力與日俱增。雖然中國大陸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問題仍然紛至沓來，層出不窮，但是，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現在的中國大陸的處境在某種意義上類似明治維新成功後的日本，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之上：二十一世紀中國大陸的道路，到底是走在最近兩百年來西方列強霸道的道路？或是走在具有傳統中國文化特色的王道道路上？中國大陸的抉擇將決定大中華文化圈的命運，也將決定未來人類的命運。

不論是從源遠流長的傳統中華文化核心價值來看，或是從二十一世紀世界新局勢來看，包括大陸、臺灣、港澳地區在內的大中華文化圈，在二十一世紀必須以「王道文化」為其歷史的道路。本文寫作的目的在於分析「王道文化」的淵源、內涵以及二十世紀孫中山（1866-1925）的新闡釋，並論證二十一世紀大中華文化圈的前途正是在於「王道文化」的實踐。

為了有效地論證本文主旨，本文將扣緊以下三個問題展開討論：

1. 什麼是「王道文化」？孟子與孫中山如何詮釋「王道文化」？
2. 為什麼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前途在「王道文化」的實踐？

⁺ 本文係 2011 年 12 月 2-3 日由中央大學、中華文化總會主辦，本院協辦之「王道文化與公義社會」研討會中發表之文章。

^{*} 臺灣大學特聘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本院院長。

3. 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大中華圈實踐「王道文化」？

「王道文化」的內涵：從孟子到孫中山

所謂「王道」雖在古代經典如《尚書》就有「王道平平」、¹「王道正直」、²「王道蕩蕩」（以上均出自《尚書·洪範》）³之語，但提倡並充分論述「王道」政治論者則是孟子（372?-289?BCE）。⁴ 孟子生於戰國時代，各國之間「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上·14》），⁵ 他痛感「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孟子·公孫丑上·1》），⁶ 他高唱「王道」政治論，實係針對戰國時代之政治現實而發。孟子所謂「王道」，指「先王之道」（《孟子·離婁上·1》），⁷ 以道德為基礎（《孟子·公孫丑上·3》：「以德行仁者王」⁸），以民本為依歸（《孟子·梁惠王上·7》：「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⁹）。「王」與「霸」的對比，是「德」與「力」的對比，也是「公」與「私」的對比，更是「義」與「利」的對比。孟子遊說各國國君，尊王黜霸，孟子所尊之王並非業已日落西山之周天子，他鼓舞野心勃勃的戰國國君推行仁政，拯生民於水火之中。孟子的王道政治論因襲民貴之古義，創造轉化，明確標舉以人民為政治之主體的主張。

孟子的「王道」政治論的核心在於「不忍人之心」，他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孟子·公孫丑上·6》），¹⁰ 他勸誡戰國時代的君王只要將人與生俱來的「不忍人之心」加以推廣、擴充、實踐，就能開創「不忍人之政」，就能達到「仁者無敵」的境界。

孟子的「王道」政治一直是二千多年來中國政治思想中最高的價值理念。在中國歷史上，崇文而不尚武一直是統治者與知識分子所嚮往的境界。二十世紀偉大史學家錢穆（賓四，1895-1990）先生早就指出：在中國史學名著中最受重視的是文化價值的傳承者與實踐者，如伯夷、叔齊、孔子（551-479BCE），而不是戰爭殺伐中的英雄人物。¹¹ 孔子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論語·季氏·1》），¹² 中國歷代政權所重視的是文治而不是武功，在對外關係上也多半強調文化的交流與融合，而不是武力的征服，體現一種「王道精神」。

中國文化中的「王道精神」，到了二十世紀的孫中山（1866-1925）獲得了最充分的發揮。孫中山在1924（民國13，大正13）年11月28日在神戶高等女校對神戶商業會所等五個團體發表〈大亞洲主義〉演講，極為轟動。

1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年），頁120。

2 屈萬里：《尚書集釋》，頁120。

3 屈萬里：《尚書集釋》，頁120。

4 我在拙著曾有所討論，參考黃俊傑：《孟學思想史論（卷一）》（臺北：東大圖書出版公司，1991年），〈第六章：孟子的王道政治及其方法論預設〉，頁161-187。

5 〔宋〕朱熹：《孟子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283。

6 朱熹：《孟子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頁228。

7 朱熹：《孟子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頁275。

8 朱熹：《孟子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頁235。

9 朱熹：《孟子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頁207。

10 朱熹：《孟子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頁237。

11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選讀》，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33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頁81。

12 朱熹：《論語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頁170。

孫中山在這場演講中，首先稱許十九世紀末年日本廢除不平等條約可視為亞洲復興的起點。接著，孫中山比較歐洲文化與亞洲文化，認為歐洲文化是科學的與注重功利的文化，是一種霸道的文化；而中國文化講求仁義道德，是王道的文化。在孫中山眼中，1920 年代的世界問題，就是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比較與衝突的問題。最後，孫中山強有力地呼籲：「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霸道的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文化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文化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¹³ 這次的演講極為轟動，日本朝野皆極為重視。¹⁴

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概念與二十世紀初年以降日本知識界的「亞洲主義」論述有關。1903 年美術史著名學者岡倉天心（1862-1913）出版《東洋的理想》英文書，提出「亞洲一體」（"Asia is one"）主張，並指出亞洲文化探求人生之目的而西方文化則追求人生之手段。¹⁵ 但是在隔年所出版的《日本的覺醒》英文書中，¹⁶ 岡倉天心就隱約中顯示從「亞洲一體論」向「日本盟主論」的轉移。在 1920 年代日本的論述脈絡中，作為思想的亞洲主義正

逐漸轉向作為行動以及作為外交戰略的亞洲主義。¹⁷ 1920 年代是中國人口快速增加，都市化與棉紡織業及新聞媒體快速發展的時代，¹⁸ 也正是日本最蔑視中國而中日關係最緊張的年代。¹⁹ 孫中山運用當時日本知識界人人耳熟能詳的「亞洲主義」這個概念，但是卻從當時日本的論述脈絡中予以「去脈絡化」，並重新植入 1920 年代中國與日本的政治關係的脈絡之中，延續孫中山從 1918 年以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公開批判，²⁰ 呼應他的〈北上宣言〉，²¹ 呼應 1924 年 8 月 7 日中國國民黨忠告日本國民宣言，批判日本排斥華工。孫中山於 1924 年 11 月 28 日在神戶另一場演講中，也呼籲日本應協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孫中山以「大亞洲主義」呼籲日本揚棄侵略中國的野心，²² 回歸亞洲文化中的王道精神，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仍具有嶄新的時代意義。

「王道文化」是二十一世紀中國的道路

世界史上絕大多數的地區在從「傳統」邁向「現代」的過程中，莫不經過革命的洗禮，百年中國更是艱苦備嘗。從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民在西方列強侵略荼毒與革命亂離之中，以血和淚撰寫中國近現代史。

13 孫中山：〈大亞洲主義〉，收入《國父全集（第二冊·演講類）》（臺北：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生籌備委員會，1965 年），頁 312。

14 關於這次演講資料，參看陳德仁、安井三吉（編）：《孫文·演講「大アジア主義」資料集：1924 年 11 月日本と中國の岐路》（京都：法律文化社，1989 年），尤其安井三吉：〈講演「大亞細亞問題」の成立とその構造〉，頁 1-39。

15 Okakura Kakuzo, *The Ideals of the East: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Hiroshi Muraoka* (London: John Murray, 1903; Tokyo: Kenkyusha, 1931). 日譯本可參：岡倉天心：《東洋的理想：特に日本美術について》，富原芳彰（譯）（東京：べりかん社，1980 年）。

16 Okakura Kakuzo, *The Awakening of Japan* (New York: Century Co., 1904) .

17 參考王屏：《近代日本の亞細亞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關於 20 世紀日本的亞洲主義之原典資料，參看竹內好（編）：《アジア主義》（東京：筑摩書房，1963 年）。

18 參考狹間直樹：〈国民革命の舞台としての一九二〇年代の中國〉，收入狹間直樹（編）《一九二〇年代の中國》（東京：汲古書院，1995 年），頁 3-32。

19 山根幸夫：《大正時代における日本と中國のあいだ》（東京：研文出版，1998 年）。

20 參考陳鵬仁：〈孫文の大アジア主義と日本〉，《華岡外語學報》，第 11 期（2004 年 3 月），頁 1-12。

21 彭澤周：〈中山先生の北上與大亞洲主義〉，《大陸雜誌》，第 66 卷第 3 期（1983 年 3 月），頁 1-19。

22 參考趙軍：《大アジア主義と中國》（東京：亞紀書房，1997 年），第 6 章〈「吾人之大亞細亞主義」における孫文の對日觀：孫文と大アジア主義〉，頁 189-234。

二十世紀的中國，所經歷的是一個憂患與苦難交織的世紀。公元 1900 年，義和團包圍北京各國使館後，清廷向各國宣戰，導致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城。1901 年，辛丑條約簽訂，中國淪為西方列強俎上肉。1911 年爆發辛亥革命，滿清覆亡，孫中山 1912 年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大總統。但是，民國成立之後憂患繼踵而至，1915 年袁世凱（1859-1916）稱帝，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暴露侵華野心；1917 年，張勳（1854-1923）復辟，接著是軍閥混戰，生靈塗炭，直到 1928 年北伐完成，中國才在形式上歸於統一。但日本軍閥侵華野心日益高漲，步步進逼，終在 1937 年 7 月 7 日，引爆蘆溝橋事件，中國展開全面對日抗戰。從 1937 年至 1945 年，中國歷經八年抗戰，人民流離失所，艱辛遍嘗。抗戰勝利之後，卻又繼之以國共內戰，1949 年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國府遷臺，從此以後禹域二分。但是大陸人民在經過十年的安定之後，又歷經「反右」（1957-1958）、「大躍進」（1958-1960）、「文化大革命」（1966-1976）等一系列的動亂與苦難。

但是，令世人驚奇的是，從文革結束後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大陸成為世界經濟的新興力量。2010 年起，中國的 GDP 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京奧與上海世博的亮麗舉辦，都見證了中國大陸經濟的飛躍發

展。在快速發展的經濟力支持之下，中國大陸高速鐵路的建設規模、里程、速度都已躍居世界第一。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崛起，帶動了亞洲的發展。日本《東洋經濟週刊》曾統計：²³ 1996 至 2005 年的十年之間，亞洲各國之間的航空旅客成長率是 109%，遠超過全球跨洲的平均成長率 60%、亞洲與北美之間的 67%、亞洲與歐洲之間的 59%，以及歐洲各國之間的 36%，海峽兩岸之間的直航班機幾乎班班客滿。而且，全球各地人口超過千萬的十九個大城市中，有十一個在亞洲。亞洲的崛起是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可以預期的新趨勢。

在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開始之際，中國大陸就像明治維新成功之後大正時代的日本一樣，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展望未來，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是走向「霸道」或是「王道」？社會經濟發展是走向求「義」或逐「利」？是走向「公」益或「私」利？中國的抉擇不僅決定大中華圈的命運，也會影響人類的未來。²⁴

從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局勢來看，自從 1989 年前蘇聯崩潰成為獨立國協，柏林圍牆倒塌兩德統一以後，世界政經板塊重組，區域經濟大幅發展。在全球化潮流沖刷之下，民族國家逐漸「解疆域化」。²⁵ 已故政治學家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 1927-2008）在上世紀末就著書指出：在後冷戰時代，傳統的國與國

23 轉引自張漢宜、辜樹仁：〈全球航空爭霸戰，亞洲佔鰲頭〉，《天下雜誌》，第 378 期（2007 年 8 月 15 日），頁 108-109。

24 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未來的動向是美國學界關心的議題，最近有學者檢討從大宋帝國和明帝國與周邊國家的互動關係，指出從 960 到 1644 年之間中華帝國一直是依循國際權力均衡的態勢，而在「和」與「戰」之間移動。作者並推測，二十一世紀中國如果力量較美弱時，中國就會採取守勢，但如果時勢對中國有利，中國會變得較為強勢。參看 Yuan-Kang Wang, *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litical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相應於中國的崛起，學者對於美國未來政策的建議也頗為分歧。季新吉在最近新書中，認為美國應避免中美雙方悲劇性的衝突，應該面對中國的崛起，以優雅的姿態讓位。參看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0)；但是也有學者指出，美國對於中美兩國利益衝突的領域，應該採取強勢的立場。參看 Aaron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New York: W. W. Norton, 2011).

25 貝克 (Ulrich Beck)：《全球化危機》，孫治本（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 年），頁 90-91。

之間的戰爭將愈來愈少，未來的戰爭將是文明與文明之間的戰爭，爆發點常會是在不同文明之間的斷層線上。²⁶ 杭亭頓的說法雖然仍有許多有待商榷之處，²⁷ 但是他的預測在大方向上是與最近二十年來的世局呼應的。在二十一世紀文明互動與對話的新時代裡，中國在世界的影響力日益擴張，絕對不應重覆過去二百年來近代史上所見的武力擴張與征服的霸道之路，而應是以文化價值的共享為基礎的「王道精神」。

霸者必亡：歷史的教訓

那麼，如果走「霸道」的道路會有何種結局呢？

最近哈佛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弗格森（Niall Ferguson, 1964-）在 2010 年 3-4 月號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論文，題為：〈複雜性與崩潰：混亂邊緣的帝國〉，²⁸ 指出歷史上的帝國都由很多交互作用的因素所組成的複雜系統，在治與亂之間迂迴前進。他回顧羅馬帝國、中國大明帝國、法國波邦王朝、大英帝國以及前蘇聯都以驚人速度快速崩潰。他最後提出結論，認為大多數帝國的覆亡都與財政之惡化有關。弗格森特別警告美國的財政赤字在 2009 年已高達 GDP 的 11.2%，而公共債務在 2008 年高達五兆八千億美元，預計至 2019 年將高達十四兆三千億美元，他悲觀地預測美國已走到崩潰邊緣。

不僅美國國勢開始走下坡，歐盟的狀況也不樂觀。在 2011 年 8 月 22 日出版的《時代

周刊》就有一篇長文檢討歐元的危機使歐盟瀕於崩解，歐盟的失業率達 9.4%，而美國已無力帶動全球經濟，美國失業率也高達 9.1%。至於歐元區的兩大經濟體德國與法國則尚無力拯救歐元。文章作者 Rana Foroohar 悲觀地以〈歐洲的結束〉（*The End of Europe*）作為他的文章標題。²⁹

弗格森與《時代周刊》對美國與歐洲崩潰的預測也許過於悲觀，但是，最近二百年來大英帝國崩潰與美國國勢的沒落，確實與財政上過度的擴張性支出有很密切關係，而「擴張性支出」的惡化，正是厲行「霸道」政治（如發動對外戰爭）必然導致的結果。這些歷史上的例證，也提醒我們「王道」精神在二十一世紀的新意義與新價值。

除了歷史上的大帝國實行霸道的擴張而覆亡的例證之外，亞洲近代史上最具有啟示性的就是日本帝國的快速崛起與敗亡。日本在推翻江戶幕府、建立以天皇為中心的新政府的「明治維新」之後，國力大振，1894 年甲午海戰打敗滿清王朝，一躍而為東亞霸權，在「脫亞入歐」的思想潮流之下，逐漸走上西方列強二百年來的「霸道」的歷史道路，企圖建立以日本帝國為中心的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為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至今無法抹去的歷史的傷痕。近代日本「文明開化」的啟蒙導師福澤諭吉（1834-1901）曾說，³⁰ 他那一代的日本人經歷明治維新的大變局，每個人都有兩個「身體」：上半身是「漢學的身體」，下半身是

26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the Remarking of the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huster, 1996).

27 Chun-chieh Huang, "A Confucian Critique of Samuel P. Huntington's Clash of Civilization," *East Asia: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vol. 16, no. 1/2 (Spring/Summer 1997), pp. 148-156.

28 Niall Ferguson, "A Complexity and Collapse: Complexity and Collapse,"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0, pp. 18-32.

29 Rana Foroohar, "The End of Europe," *Time*, vol. 178, no. 7 (August 22, 2011), pp. 20-25.

30 福澤諭吉：《文明論の概略》（東京：岩波書店，1997 年）。中譯本：北京編譯社（譯）：《文明論概略》（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年），〈序言〉，頁 3。福澤諭吉本人就是他所說的「一身兩世」、「一人兩身」的代表人物，參看福澤諭吉：《福澤諭吉自傳》，馬斌（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年）。

「洋學的身體」。我們不妨說：所謂「漢學的身體」就是東方的文化，所謂「洋學的身體」就是西方的文化。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日本在「洋學的身體」主導之下，走上了侵略鄰國的「霸道」的歷史道路，而終於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宣布「無條件投降」，二戰結束，日本帝國「霸業都隨劫火殘」（徐復觀詩句）！³¹

其實早在 1924 年 11 月孫中山發表〈大亞洲主義〉演講，正告日本應回歸「王道」的東方文化之前八年，印度偉大詩人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獲 1913 年諾貝爾文學獎）在 1916 年訪問日本時，就在以〈日本的民族主義〉為題的演講中告誡日本：「全世界在等著觀看這個偉大的東方民族從現代手中接受機會和責任以後準備做什麼。如果是單純照抄西方，那麼它喚起的巨大希望將會落空。因為西方文明向全世界提出了嚴重的問題，但是並未找到圓滿的答案。」³² 泰戈爾進一步指出：日本真正的危機在於以西方的民族主義作為動力，使日本的社會理想敗於政治之手。他呼籲日本回到「不是掠奪的和機械效率的文明，而是精神文明和以人類各種深厚關係為基礎的文明。」³³ 泰戈爾在 1916 年對日本的期許與孫中山在 1924 年對日本的呼籲前後呼應，都希望日本回歸東方的「王道文化」。但是，從 1920 年代以後日本帝國所走的是棄「王道」而走「霸道」的道路，導致了悲劇性的結局。

「王道文化」在二十一世紀大中華文化圈的實踐

現在，我們可以進一步探討「王道文化」的核心價值及其實踐。

孟子所提倡的「王道」，包括兩個核心理念：第一，強調分享而不是獨占。孟子所堅持的王霸之別的基礎，就是義利之辨。先秦孔門「義」「利」對舉，崇「公利」而斥「私利」。孔子答子張問從政之道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篇·2》），³⁴ 所謂「利者，義之和也」（《易·乾·文言》），³⁵ 皆指「利」之分享才能成就「義」。孟子告誡梁惠王「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³⁶ 啟示我們「分享」正是「王道」政治的核心理念。

孟子的「王道」的第二個核心理念在於「推恩」與「擴充」。孟子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孫丑上·6》），³⁷ 其關鍵在於統治者將他的「不忍人之心」擴而充之，例如大禹這種聖王「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孟子·離婁下·1》），³⁸ 所以必須將統治者的愛人之心推擴出去並加以落實。

從「王道」精神的核心理念出發，理想的政治政策是以德治國，正如孟子所說：「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孫丑上·3》），³⁹ 這種以「德」而不以「力」的新政治，可以達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孟子·梁惠

31 徐復觀：〈東行雜感〉，收入《中國文學論集續篇》（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1年），頁252。

32 泰戈爾：《民族主義》，譚仁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頁30。

33 泰戈爾：《民族主義》，頁36。

34 朱熹：《論語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頁194。

35 朱熹：《周易本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162。

36 朱熹：《孟子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頁202。

37 朱熹：《孟子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頁237。

38 朱熹：《孟子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頁299。

39 朱熹：《孟子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頁235。

王上·7》)的境界，擺脫「國強必霸」、「霸者必亡」的歷史宿命。「王道」政治必然照顧大多數人民的生活福祉，達到「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3》)⁴⁰的小康社會。

以「王道」精神為基礎的社會經濟政策，必然本於「分享」的價值理念，1950年代臺灣所實施的「公地放領」、「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政策可以作為歷史上的典範，代表孫中山民生思想的初步落實。1924年8月23日，孫中山在廣州對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生訓話，就曾闡示「耕者有其田」政策是保護農民的具體措施，孫中山說：「我們解決農民的痛苦，歸結是要耕者有其田。這個意思就是要農民得到自己勞苦的結果，不令別人奪去。」⁴¹孫中山對中國農民的處境深致同情，但是，民國成立以來的紛擾亂離，並沒有給國民政府在大陸上實施土地改革的機會，直到1932年10月，福建龍岩實施土地改革，至1934年6月草草結束。1943年，福建省政府通過「扶植自耕農辦法」，1949年1月實施，但因戰亂而成效不彰。此外，四川省也在1949年初夏，在全省138縣實施減租計畫；貴州、廣東兩省也有零星計畫，但均因戰亂而毫無成效可言。直到1949年3月開始，在臺灣所推動的系列土地改革計畫，才算在歷史上踏下了腳印。1950年代初期臺灣土地改革政策的成功，徹底改變臺灣的土地所有權的結構，自耕農戶數急速增加，1953年自耕農戶數佔全省總農戶數的百分比驟增至54.85%，

1954年佔57.59%，1955年是59.12%。整體而言，1951年至1960年的十年之間，自耕農戶數佔總農戶數的55.92%。而且，自耕地在全臺灣的可耕地總積所佔的百分比也大幅提昇，1952年佔57.24%，但到1953年就一躍而為75.43%。⁴²這種土地所有權結構的改變，創造了強有力的自耕農階級，並隨著農業的復興而帶動工業的發展，為1960年代中期以後臺灣的都市中產階級的茁壯奠定基礎，成為1980年代以後推動臺灣的民主化的社會力量。⁴³

結論

在人類歷史第三個千年紀元的第二個十年開始之際，歷史正呼喚著中華民族回歸「王道文化」的正軌。正如毛澤東(1893-1976)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所說：「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⁴⁴二十一世紀中國大陸在「王道」與「霸道」十字路口上的抉擇，不僅決定全體華人社會的動向，也帶動世界的未來命運。只有中國大陸走向「王道」的坦途，人類的和平才獲得保障。

中華文化與社會的核心價值理念就是王道精神。二十世紀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曾在1920-1921年來中國一年，他在1922年出版的《中國之問題》這本小書中，雖然感嘆當時中國之式微與喪亂，但是他對中國人之愛好和平、容忍異己、與人為善、喜愛自由、厭惡宰制他人等美德推崇備至。⁴⁵九十年前羅素對中國文化王道精神的推崇，在中國崛起的二十一世紀特別具有深刻的啟示。

40 朱熹：《孟子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頁203。

41 孫中山：〈耕者要有其田〉，收入《國父全集（第一冊·三民主義）》（臺北：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生籌備委員會，1965年），頁248。

42 Rural Economics Division, JCRR, *Taiwan Agriculture Statistics, 1901-1965* (Taipei: JCRR, 1966), pp. 9, 12.

43 黃俊傑：〈土地改革及其對臺灣農村與農民的衝擊〉，收入氏著《戰後臺灣的轉型及其展望》（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年），頁55-70。

44 《毛澤東選集》（北京：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1951年），頁626。

45 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 of China* (London: Allen & Unwin, 1972), chapter xi, esp. 195.

在二十一世紀歷史旋乾轉坤的關鍵時刻裡，臺灣實居於極端關鍵性之地位。臺灣島的地理位置極為優越，地處太平洋與歐亞大陸交界，是漢民族海外移民最大島嶼，更是東西文化交流的樞紐，所以在十九世紀末甲午戰爭前三年（1891-1894），池志徵（1853-1937）從上海來臺遊覽，三載之間遍跡全臺，他在《全臺遊記》結語中說：「臺灣雖海外一島，然亦東南七省藩籬，〔……〕臺灣不失則東南半壁屹若長城，臺灣若失則沿海諸省豈遂保百年無事乎？」⁴⁶ 臺灣在地緣政治學上的重要性，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更是與日俱增。

但是，臺灣除了地理位置的優越性之外，更重要的是人文風土的特殊性在於以中華文化為基礎所開展的多元文化，數百年來不同時代的政權與人民，都為臺灣注入了新的文化生命力與活力，共同演奏扣人心弦的文化交響曲。

在臺灣多元文化交響曲中，呈現的主旋律就是潛藏在臺灣的民間社會中，底蘊深厚的「王道文化」。這種以「中道精神」為基礎的「王道文化」，未經十年動亂的摧殘，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精神汙染」相對而言也較不嚴重，臺灣民間社會中展現充沛的慈心、悲心與愛心，使任何走極端的政治主張或社會經濟政策，無法獲得多數民意的支持。這種「王道文化」的傳承，將在二十一世紀隨著大陸的崛起而成為民族復興的精神資源，並成為未來東亞文明的共同資產。

46 池志徵：《全臺遊記》，收入《臺灣遊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臺灣文獻叢刊》第89種），頁16。

從數位典藏到數位人文 ——談檔案的多重脈絡⁺

項潔*



數位與人文結合的契機

在數位資訊日新月異的今日，文獻資料數位化已經成為時代的趨勢，無論臺灣的各級研究機構，乃至全球各地，各式各樣的數位典藏工程都正不斷的在推動與進行著。量的增加必定會帶來質的變化，數位典藏如果只是單純提供典藏，將既有的紙本文字或圖像，轉變成網頁上的圖檔或文字檔，是有些可惜的，數位技術可以帶來更多的可能，替人文研究可以帶來更多的協助。這也是為什麼數位典藏的發展迄今，已逐漸朝向數位人文的方向發展的主因，無論是資訊技術端的開發者或人文學科的研究者，都越來越注意到資訊科技和人文研究兩者的有機結合。

數位人文的發展歷史

數位人文和所有的學術門類一樣，皆非憑空而生，而是長久摸索、醞釀之後的結果。數位人文的起點可溯源至上世紀「人文計算」（Humanities Computing）的發展，最初應用於文學研究的領域，諸如以電腦對 St. Thomas Aquinas 和莎士比亞的作品進行研究。在歷史學的領域裡，亦有學者開始應用資訊科技在處理大量資料上的優勢，進行統計和量化的研究，開啟所謂的「計量史學」（Quantitative History）。數位人文的突破性發展則在 2000 年前後十年，個人電腦的普及與網際網路的出現，使數位和人文的結合提升至另一層次，數位化典藏、資料庫的建立成為可能，如雨後春筍般，世界各地都開始致力於將文物、檔案等

⁺ 本文係 2011 年 11 月 25 日本院人文社會科學討論會內容。

* 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特聘教授、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主任、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資料數位化置於網路珍藏的行列。各式各樣的資料庫開始出現多數的歷史文獻被掃描、拍照，製成了與原件極為相近的、存真度高的數位影像，並由專人撰寫補充描述文獻背景的 metadata（詮釋資料）；亦有以文獻內容的全文打字的方式，進行數位化。凡此，都對人文研究環境和知識取得帶來了巨大的改變，資料庫的檢索與應用逐漸成為研究者在研究過程必要的環節；而綜合人文計算和數位典藏所累積的經驗和能量，也開啟了數位人文的新頁。

對數位人文發展的質疑與回應

但數位人文的旺盛擴展，也面對了質疑的聲音。其中最大的不安，在於原本紙本檔案保存的脈絡，是否會在數位化過程中遭到破壞？要回應這樣的質問，我們必須回顧傳統檔案學的保存原則，即依機構、依時間、依事件的整理，其目的便在於保存所謂檔案的原生脈絡。但這樣的原則本身便隱藏著矛盾，如依事件的整理即會打破檔案依機構和時間所產生的原生脈絡，編纂者的後見主觀和選擇必然會對檔案造成影響。更何況從研究的角度，人文研究本身便是要從史料既有脈絡中，重新找出新的解釋脈絡的過程。是以，紙本檔案的脈絡本身便是具變動可能的，原生脈絡是參照的座標而非侷限。進入數位化時代後，檔案的儲存不同於紙本，資料的性質在類型上更「多元」，資料的來源往往也更為「多源」；此外，數位化檔案由文字轉化為位元後，檔案的呈現亦更將原子化。然而，這並不表示檔案數位化將破壞原本脈絡，恰恰相反，數位化後檔案的原子化特性，反而較紙本更具調整和變動的可能，產生紙本檔案所無法想像的多元脈絡。要實現這樣的可能，必須建立起一個功能強大的系統，這才是檔案數位化的關鍵，數位檔案無法離開系統而單獨存在，系統的好壞將決定檔案的可用度。檔案檢索系統應儘量提供文件的各種脈絡

及觀察脈絡的環境。是以，系統的建構不應再只是檔案數位化過程中的附屬物，而是依據檔案特性所設計的重要環節。

數位人文系統所能提供各種的脈絡

以臺大數位典藏中心的研究成果為例，一個好的系統所能提供的各種脈絡可能，分別為：

- （一）檔案原始的脈絡：在保存原生脈絡前提下，提供使用者進行瀏覽。
- （二）重組原始脈絡的多元組合：依循既有知識結構，提供各種重組的可能。
- （三）鳥瞰型的脈絡：即對系統中的所有資料，進行整體的觀察，使其全體的意義能獲得顯現。
- （四）子文件集之縱觀的脈絡：提供使用者將其感興趣的文件於整體文件集中抽出，存成子文件集，再透過後分類的方式，將散在檔案各處的檢索成果，以原來知識結構裡的多重脈絡整理與呈現。
- （五）文件間統計型的脈絡：將文件子集中的文字，進行數量的分析。
- （六）文件間隱藏的新脈絡：即利用數位技術，挖掘出單純以關鍵字檢索所無法觀察，藏於語意（semantics）中的脈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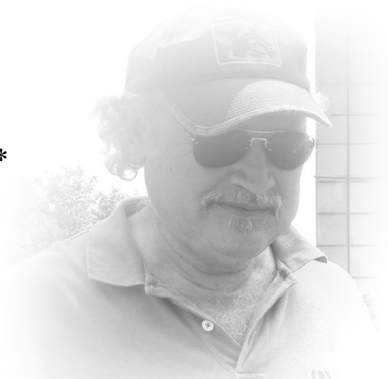
結語

總結上述，經由檔案的數位化，檔案單一脈絡的限制被打破，檔案整理與檔案研究之間的矛盾隨之減輕；而透過檔案檢索系統的設計，檔案的豐富且多重的脈絡可被發現、被呈現、被觀察。因此，檔案檢索系統是未來在思考檔案數位化時不可或缺的關鍵方法。

【多元觀點】

"10th Anniversary Symposium" of the Helsinki University Collegium for Advanced Studies⁺

Kirill O. Thompson^{*}



The Collegium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elsinki ranks among the most well-established and successful university-based institutes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whole world. The Helsinki Collegium has developed effective ways to stimulate fruitful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moreover, sponsors fruitful dialogues betwee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ers and among social scientists. Importantly, they have shown that the humanities scholars bring a sense of human values, cultural perspective and historical vision to the social scientists, while the social scientists in turn challenge the humanities scholars to keep their eyes to the ground and back up their insights.

In this spirit, the panel sessions at the 10th Anniversary Symposium addressed two challenging questions: "What's the Use? The Human Scienc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Why Institutes of

Advanced Study?," respectively, on March 20 and 21. (Regarding the former question, the expression "human sciences" encompasses the humanit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European academia.)

The Symposium opened in the morning of March 20 with Prof. Paavo Hohti, CEO, Finnish Foundationns and Prof. Marja Makarow, Chief Executive, European Foundation, giving general explanations of "What's the Use?" In the afternoon, various Collegium fellows spoke on how they "Put Use into Practice." Their fascinating presentations, to mention just a few, included Sari Kivisto on "J. B. Schupp and a 17th Century Satirical Utopia of Useful Knowledge," Nikolay Koposov on "History and Democratic Citizenship," Kirill Postoutenko on "Social Asymmetries: How They Shape Our Lives," Peter Swirski on "Two Cultures... and the Twain Shall Never Meet," Thomas Wallgren on

⁺ The conference was held at the Helsinki University, October 20-21, 2011

^{*} Professor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Associate De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earch for Truth as Search for Oneself: Socrates and Gandhi on the Unity of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and Sirpa Wrede on "Professionalism is an Inequality Regime in Globalizing Care."

At noon on March 21, Carsten Dose of FRIAS at Freiberg University, Kirill Thompson of IHS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 Taipei, Aafke Hulk of NIAS at Waasenaar, Barbro Klien of the Swedish Collegium at Stockholm University and Bjorn Wittrock of SCAS in Uppsala held a panel on the rationales and contributions of their respective institutes of advanced learning. They mentioned the measures taken by their institutes to stimulate creativity and productivity as well as to foster substantial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IHS at NTU was distinguished with its program-based research approach applied to topics and issues of regional concern and drawing on the strengths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faculties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 the afternoon, Arto Haapla, Sami Pihlstrom and Raimo Vayrynen all spoke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of the Helsinki Collegium in reaching its present highly successful and productive state.

This conference featured a very innovative approach to presentations. The presenters had to distill their presentations into *a five minute essence*. In this way, the audience could catch a vivid, clear picture of each presenter's main points and moreover there would be ample time left over for discussion. Since the audience was stimulated by the brief presentations — and not worn out as usual by long presentations — the discussions were animated and highly stimulating. Additionally, I had the pleasure of meeting the world-renowned Kant scholar, Kenneth Westphal, who is a Collegium board member

An important point arose from the discussions. Humanities scholars often have important insights that could inform and influence the work of social

scientists, who sometimes suffer from tunnel vision and a lack of historical sense. During a talk on the misuse of surveys and statistic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 was reminded of the similar critiqu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made by Dostoevski in *Notes from the Underground* back in the mid-19th century. Also, during a talk on asymmetries, the speaker mentioned the asymmetry between first-person reports and third person reports of experience, I recalled Wittgenstein's critique of this very distinction on the basis of how human beings learn and use language in the stream of life. For Wittgenstein the distinction is grammatical only, not philosophical.

Finland is a country that is deeply dedicated to the ideal of human equality, not only the rights of every person to interpersonal respect and the necessities of life, but the entitlement of every person to a good education and th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hey deserve. Every East Asian country, even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learn from Finland's egalitarian ideal, because it has brought 1) relative general prosperity to the country as a whole as well as to each of its citizens, 2) a balanced, fair and uncorrupt political system, 3) a happy, healthy, intelligent population and 4) a social harmony that underlies the inevitable social disputes. Amazingly, every elementary school, junior high school and senior high school is basically equal in quality, and the average standard is quite high. The tuition is free, so students from less affluent families have an equal opportunity to go on for further study if they have the talent. Moreover, people all enjoy mutual respect and a decent salary, no matter their standing on the social scale, so the public life and social discourse are more intelligent and better informed than in most societies. Every country can learn from Finland's positive example.

This egalitarian ideal in mind, Antti Arjava of the Finnish Cultural Foundation questioned the rationale for funding Institutes for Advanced

Studies when the elite scholars there can easily secure research funds *via* other channels and when the funds dedicated for the IASs could be better used to fund the general schools or even assistance to the low achievement students who really need assistance! Such arguments would rarely be heard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East Asia. However, the leaders of the Helsinki Collegium and of the other IASs present replied that although IAS funding might look like a substantial amount of money, in fact it is miniscule when compared to the overall budgets of the host universities and school systems. They argued, moreover, that the IAS provides unique occasions to bring together researchers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in a setting slightly removed from the ordinary push and pull of university life. The IAS thus provides a unique laboratories for fruitful reflection and innovation. The presentations by the fellows on the previous afternoon provided ample evidence of the value and impact of the sort of work being conducted at the Helsinki Collegium and at other IASs, including NTU's IHS.

Personally, it was a great honor for me to attend this Symposium as a representative of IHS at NTU. In fact, the organizers of this Symposium invited me to be a presenter at this event on the basis of two earlier presentations I gave at 1) FRIAS's conference on UBIAS held at Freiberg University in the Fall of 2010 and 2) Trinity College's Long Room Hub founding conference of ECHIC in Dublin in the Spring of 2011.

After attending the Symposium in Helsinki, I flew to Copenhagen to visit a Sinology professor at Copenhagen University and the Kierkegaard Research Center there. I discussed cooperation and academic exchanges with Sinologist Bent Nielsen and developments in Kierkegaard research with Professor Jon Stewart. We discussed activities and possible cooperation in regard to the Kierkegaard Bicentennial to be observed in May 2013. Lastly,

I took the train to Hamburg, Germany where I met Sinologist Michael Friedrich who showed me their new Center for Manuscript Studies at Hamburg University. We also discussed possible paths of organizational cooperation. All in all, it was a short but fruitful journey to northern Europe.

【多元觀點】

跨越國境的歷史與東亞 ——從日韓思想史的視域思考⁺

桂島宣弘^{*}
田世民^{**}譯

世界的全球化已喧騰多時。的確，於瞬息之間將全世界的情報手到擒來的時代已然來臨，我們可以透過網路等途徑輕而易舉地取得地球上眾多區域之各種政治、經濟、文化的相關情報。但是，如何整理和理解這些情報的「尺度」本身（即使 post-nationalism〔後國族主義〕相關的重要理論已有變化的徵兆）依然是以國民國家為單位，我們無法脫離以民族（歸屬的國籍）或國民語言等單位來觀察、思考世界的這個情況故態依舊。猶有甚者，經常日擊到的現象是：在自詡對地球史＝整體史的理解有重大影響的馬克思主義退潮的同時，所謂世界的全球化管理終究無法超越進行國民文化比較的框架；而且，歸結到國民文化論的後果，反而通過「差異的確認」更強化了本質還原論。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為了將歷史「開放」至全球，現在最受矚目的是韓國近現代史研究者尹海東所提倡的「transnational history（跨越國境的歷史）」這個概念。若論起 transnational history，這裡的 trans 是一個包含 across（橫跨）、beyond（超越）、through（貫通）等意思的接頭詞，所以 transnational 這個用語包括了「橫跨國家的」、「超越國家的」、「貫通國家的」等涵義。因此，所謂 transnational history 即是「橫跨國家的、超越國家的、貫通國家的」歷史。我特別留意 trans 的意思當中 through（貫通）＝「互換性」「共時性」這個部分。簡言之，藉此可以迴避經常附著在 global history（全球歷史）或 world history（世界歷史）等概念（即使其原本的意圖不在於

⁺ 本文係 2011 年 8 月 12 日本院人文社會科學討論會內容。

^{*} 日本立命館大學文學部教授兼文學部長。

^{**} 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此)上之國民史總合的誤解。此外，現今雖然分歧成為各式各樣的國民國家，作為一個概念，從過往曾經共同擁有的共時性結構來處理帝國＝領域的歷史、掌握至近代為止的互換性歷史結構，這個 **transnational history** 是個極其有效的概念。

德川思想史(或是明清思想史、朝鮮思想史)的世界，作為思考 **transnational history** 之敘述的可能性，是一個極為有效的分野。例如：藤原惺窩對明朝、朝鮮、安南的「文化力」、(近世帝國＝中華世界之)共時性世界寄予強烈的信賴等這些特點，在在顯示德川王朝的知識人極為常識地將朱子學視為共時性的學問，吾人可以從中分析出東亞之共時性、互換性的思想結構。此外，在朝鮮王朝，對於前後近百年動亂的明清王朝更替，朝鮮小中華思想之自我意識幾乎在整個十七世紀超越學派成為一般性的意識，到了十八世紀，更轉向發展出視朝鮮為唯一的中華之朝鮮中華主義。這個思潮是 **transnational** (跨越國境)地與德川思想史的轉向處於共振的關係。

當然，對於包括思想史領域、熟悉近代歷史學的人來說，從 **transnational** 的視角來記述歷史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謂近代歷史學，是指根據近代實證主義的方法而建構的國民史＝一國史的記述模式；實證主義的方法雖然會被前景化、自為 (*für sich*) 化，但「國民史的記述模式」要被自為化卻極為困難。要進行 **transnational** 的歷史記述，非得同時進行重新檢討 **meta-level** (後設層次的) 框架的工作才行。為了進行重新檢討的工作，必須與韓國、中國、臺灣等東亞地區的人士、研究者積極地累積共同研究。這樣的工作已經在各種場面啟動，也獲得了若干重要的成果。但是，如要進一步地向前推進，超越自國史之間的對照、進行 **transnational** 視角的轉換是所在必至的課題。

日本人的中國革命傳統 ——論其再生與消逝⁺

馬場公彥*
廖欽彬**譯

從現在算起剛好一百年前，在 1911 年發生了辛亥革命。日本經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勝利後，改元為大正，不僅推翻藩閥政治，還推動了以憲政與民主主義之實現為目標的社會運動。日本朝野受到清朝被武力推翻這種衝擊，將其和自國的維新體驗相比較的同時，認為其是一種「共和革命」。然而此種認知經第一次大戰勝利後有所轉變。日本認為該革命是失敗的，並決定加入列強瓜分中國領土的行列。此時日本已被進出大陸的野心所掩蓋。

隨著北伐帶來的統一政權樹立而產生的「國民革命」在「日支合作」與「東亞新秩序」的美名下被迫進入抗日戰爭，當該戰爭的戰線在擴大時，大多數的日本人誤判了其抗戰能力的實際狀況。另一方面，亦有將

「支那統一化論爭」與「支那再認識論」視為國家建設的現實，並正面評價中國民族主義力量的日本人。

日本的戰敗亦是讓人察覺到上述對同時代中國錯誤認知的契機。不要說被解除武裝的軍人集團，就連不脫古典文化之傳統中國觀的「支那學者」、一直在流傳落後性與侮蔑性印象的「支那通」，甚至是針對土地改革與中國共產黨的支配區域沒有做完整情勢調查的當地調查研究員，都被視為是錯誤認知的元凶。相反的，反而是作為能將「新中國」現況與前途活生生傳達的情報源最受到注目。這些情報源其中包括，從以延安為中心的中國共產黨支配區域歸還的原捕虜、出獄的日本共產黨員以及在中國能進行採訪活動的歐美親中派記者。

⁺ 本文係 2011 年 9 月 22 日本院人文社會科學討論會內容。

* 日本岩波書店編集局副部長。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直接和中國接觸的日本人，一方面對侵略中國抱有贖罪的心情，另一方面對禁止報復的中國感到有恩情。相同的，這些人亦對臺灣的國民黨政權抱有贖罪與恩情的心態。在戰敗後的美軍占領下，接受美軍檢閱下的媒體統治，右派的言論空間變得極為狹窄。另外要求非軍事化、民主化的占領政策，隱藏了另一個脫殖民地化的契機，使得占有半世紀的臺灣及其住民的存在變得不可視化。

即使在國共內戰，此種偏重左派的中國認知框架，仍持續存在著。1949年，美國國務院發表《中國白皮書》，助長了批判國民黨與擁護共產黨的傾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帶給人因土地改革所引起的農村革命之印象非常強烈，中國共產黨被認為是擔負統一政權的正當權力，清新的「中國革命」圖像，自此刻劃在日本人的印象當中。

然而國際情勢加速東西對立局面的速度，「清白中國」逐漸地變成「紅色中國」。正當日本準備脫離美軍占領回到國際社會的時候，被迫面臨和西方部分講和，或包含社會主義圈的全面講和這兩種政治性抉擇。很多中國論者主張全面講和下的平和共存，並批判日本的「對美一面倒」及再軍事化，而部分講和論者則對中國的「對蘇一面倒」與「革命輸出」抱持著警戒。

朝鮮戰爭進入停戰，1954年發生了第一次臺灣海峽危機，當美中軍事對決逐漸帶有現實意味時，臺灣的存在也漸漸地變得可視化。1955年在萬隆的第一次亞洲·非洲會議中呼籲非同盟中立、平和五原則的是中國，然在1958年卻發生第二次臺灣海峽危機，「兩個中國」論因而開始尖銳化。1959年面對西藏動亂，人民解放軍出兵鎮壓，並因領土問題和印度之間發生武力紛爭，於1964年則開始進行核試

驗。中國的「平和共存」印象就此破滅。另外，因以赫魯雪夫批判為契機的中蘇對立，對社會主義的信賴也開始在產生動搖。在國內，整風運動、三反五反運動、胡風事件等思想改造運動，隨著大規模化、過度激烈化，被視為是封殺自由思想的肅清運動。

文化大革命與建國時的「中國革命」圖像大不相同，是都市青年族群帶頭推動的，這和火爆的年輕人、校園鬪爭具有世界共時性，給予日本論壇與社會運動莫大的影響，然而文革論卻陷入了混亂。1971年的林彪事件與隔年的日本連合赤軍事件，澆熄了沉浸在革命當中的陶醉感，學生運動也開始恢復平靜，隨著文革的權力鬪爭、無法想像的暴力及破壞的實際情況明朗化後，對「中國革命」的敬意與關心，也逐漸消失。

文革在如火如荼進行時，中日邦交開始正常化。在此正常化中，戰敗後不久的部分講和派與全面講和派，變成實質利益派與道義派，朝野雖以該形式分成兩派，卻都非常關心恢復邦交的是與否。在那裡，臺灣問題不僅沒有得到解決，甚至還被置之不理，在戰爭責任問題上，則以放棄賠償要求的形式，得到表面上的解決。然而日本方面的不徹底反省與在論壇中的反中國言論，作為之後歷史認知的問題，到現在仍然以變換主題的方式在持續著。

辛亥革命以來的百年「中國革命」圖像，正作為一種中國認知框架，規定著日本人的「近現代中國」認知。在這層意義上，其作為替代古典中國文化傳統的新傳統，已經開始生根。然而，現在將中國革命作為日本的問題並從內部來捕捉的契機，顯然已經消失。對現今日本人而言的中國圖像，只是眼前那樣的外部客觀觀察的對象，在論壇上，近代以降的多元中國論的論者，幾乎都被歸類為中國觀察者。在學術界裡，革命以前的傳統中國，只存續在

中國學的文獻世界裡，眼前的中國作為現代中國研究者觀察與分析的對象，已被做了各種不同的區分。說到「革命中國」傳統，其只不過是其中間的近代中國史研究者的研究領域而已。即使在中國，在改革開放甚至是南巡講話以後，同樣地「中國革命」傳統不也是完全都看不到了嗎？

本論將以論壇與學術界的言論動向為線索，來探索戰後日本人的中國認知框架及過程，特別是歷經百年的近代中國革命經驗的軌跡。

【多元觀點】

韓國的「傳統」文化與現代政治經濟構造⁺

宋錫源^{*}
陳永峰^{**}譯



東亞諸國，特別是韓國的「現代」，可以說是從否定長期以來規制韓國社會的「傳統」當中出發。由於所謂的「現代化」，幾與「西歐化」同義，這使得「現代」到來之前，東亞各國的「傳統」在面對實力日漸強大的「現代」或「西歐」時，無可避免地陷入苦戰。而「現代」的出現，必須超越「傳統」。也就是說，當「現代=西歐」強壓而來之時，「傳統」只能無可奈何地退居於後。¹

「現代」到來之後，傳統猶如時代的遺物。時至今日，我們不只通過了「現代」，連「後現代」都已被提起許久。然而，不論任何國家、不管其處於任何發展階段，事實上，現實的狀況幾乎都是現代、後現代與傳統並存。

甚至我們可以說，晚近，在某些特定的問

題領域當中，傳統的重要性正在快速地回歸。例如，當世人提起東亞各國令人炫目的經濟成長經驗時，首先被強調的總是東亞地區以儒教為核心的傳統價值觀與文化。這樣的說法，幾成定論。現在，擺在我們眼前的景象是，傳統精彩復活，對儒教重新給予評價的潮流也方興未艾。

東亞地區，就算再晚，也在進入十九世紀時，傳統與現代的對決即已展開。當時，代表此一地區傳統文化的儒教，已然處於陳腐而且了無生氣的狀態。理所當然，儒教已被視為歷史的遺物。但是，當時對於儒教的理解，卻仍多以家族主義（集團主義）、上下秩序、寄生、空談、宿命主義（命運論）等內容作為主軸。也就是說，如果儒教只有上述內容，那麼

⁺ 本文係 2011 年 9 月 22 日本院人文社會科學討論會內容。

^{*} 韓國慶熙大學政經系教授、主任兼日本學研究所所長。

^{**} 東海大學共同學科暨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跨領域日本區域研究中心執行長。

¹ 參見野村伸一：《巫と芸能者のアジア》（東京：中央公論社，1995 年）。

毫無疑問地，我們幾乎可以斷言，以儒教作為思想核心的東亞地區，沒有絲毫達成經濟發展的可能性。

然而，到了今天，眾所皆知，在非西歐型的國家／地區當中，唯有東亞達成了和西歐相同水平的經濟發展。韓國的經濟發展成果，當然也是東亞成功事例中的一部分。

雖然韓國與其他東亞國家同屬儒教文化圈，但是，一般認為，韓國受到儒教文化的影響尤大且深。韓國的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無疑是到達「現代」的成果，而此一成果也反過來成為「傳統」回歸的原因。

目前的韓國社會，存在著許多難解的習題。其中，高齡者社會福利民主主義（silver democracy）及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或許都將在今後的韓國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中，佔有重要的政經意義。前者，在少子化與個人主義愈來愈顯著的今天，隨著銀髮族的增加，被視為傳統美德的家族主義，勢將再度受到矚目。而後者，正好與前者相對照，問題將在於「傳統」能否或如何自我調整，以求對應多元文化社會逐漸成型所帶來的社會變化。

亦即，今天在某類問題上，韓國的傳統文化被認為是解決問題的不可或缺之物。但是，同一時間，在另一類問題上，同樣的韓國傳統文化卻又被認為必須配合社會現狀自我調整，否則無法對應社會結構的急遽變化。

此次的演講，本人就將以上述觀點，說明韓國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中有關「傳統」的問題。

韓、日「新型夥伴關係」 ——評估與展望⁺

姜龍範*



緒論

冷戰體制下的韓日關係是美蘇冷戰的直接產物，韓國和日本是美國遠東戰略棋盤上重要的棋子，基於反共戰略，美國將韓國和日本趕上了同一輛戰車。冷戰結束以後，日本相應地調整對朝鮮半島的政策，並制定了新戰略和新策略。在對韓關係上，爭取同韓國徹底實現關係正常化，即結束過去，開闢未來，努力構建新形勢下的日韓關係。韓國政府也抓住世界格局轉換的歷史機遇，積極調整對日政策，努力構建韓日「新型夥伴關係」。

雖然盧泰愚、金泳三兩屆政府都試圖從新的高度制定對日政策框架，推動新韓日關係的建立，但兩國關係發展並不順利。上世紀 90 年代中期以後，日本政治右傾化傾向日益嚴

重，閣僚接連在歷史問題上大放厥詞，美化侵略戰爭，進一步損害了原本脆弱的兩國關係。尤其是，1996 年 2 月兩國就「獨島」（日本稱「竹島」）歸屬問題發生的嚴重爭執，又給兩國關係帶來了新的裂痕，導致兩國關係降至建交以來的最低點。翌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到 1998 年初，韓國的金融危機發展為全面的經濟危機，韓國正經歷著「朝鮮戰爭以來最大的一次國難」。

面對「國難」，韓國國民反思政治、經濟體制弊端的同時，對金泳三政府的對日政策也提出了質疑。1997 年底，韓國國內要求反省過去對日外交的呼聲漸高，認為「金泳三政權在歷史認識和領土等問題上過分地刺激了日本人的感情」。韓國主流媒體《中央日報》和《朝

⁺ 本文係 2011 年 11 月 29 日本院人文社會科學討論會內容。

* 吉林延邊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兼院長。

鮮日報》紛紛發表評論，呼籲「重新恢復已荒廢了五年的韓日關係」。

在韓國面臨歷史上空前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難題的非常時刻，金大中上臺執政，並在內政、外交方面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而修復「荒廢了的韓日關係」則是金大中對外政策的核心課題之一。為了扭轉歷史問題和冷戰戰略左右的對日政策，金大中總統提出了韓日關係「新思維」。

盧武鉉上臺後，韓日首腦圍繞朝核問題、地區合作等事宜進行了一系列互訪，雙方均明確表示要加強合作。盧武鉉還承諾，在其任期內不再向日本正面提及歷史問題，不再把歷史問題作為影響兩國關係的因素。

李明博當選總統後，承諾要繼續加強與美國的同盟關係、著力構建與日本的正常關係。隨後，雙方就恢復兩國每年一次的首腦互訪達成一致，並決定將兩國關係提升為「成熟的合作夥伴關係」，雙方表示「正視過去，面向未來」，低調處理兩國間的歷史問題和領土爭端問題，給人以「日韓新時代」即將到來的印象。日本媒體甚至將「謀求超越歷史」的李明博稱作多年來難得的「第一位親日的韓國總統」。

金大中上臺執政與韓日短暫的「蜜月時期」

在金大中政府初期，韓日關係有了實質性的發展。首先，簽訂《漁業協定》，解決了兩國僵持多年的漁業糾紛。其次，兩國在經濟和安全上的合作也前進了一步。10月7日，金大中總統對日本進行了正式訪問，並與小淵惠三共同簽署了《日韓共同宣言——面向 21 世紀的新合作夥伴》及其附屬檔《面向 21 世紀日韓雙邊合作行動計畫》。在《共同宣言》中，日本就過去的殖民統治向韓國做書面反省和道歉，金大中總統則表示今後不再提歷史問題，

從而使兩國首次以檔的形式「清算」了過去的歷史，韓日關係終於迎來了歷史的和解。

但是，進入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年頭以來，韓日關係急轉直下，其起因就是「歷史認識問題」。在「歷史問題」的陰影下，韓日關係的發展嚴重受阻，首當其衝的便是軍事交流。2001年4月，小泉純一郎上臺執政，並於當年8月13日正式參拜靖國神社，從而把韓日關係進一步推向了歷史問題摩擦的深淵。

2002年6月，韓日共同舉辦世界盃足球賽事，對於改善兩國關係來說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為了韓日關係迅速恢復和發展，雙方展開積極的「足球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兩國關係。

金大中執政的五年來，韓日關係取得了不少進展，但仍然存在不少問題。可以說，進展與矛盾並存，韓日兩國需要合作，也需要越過歷史積怨等合作的障礙。

盧武鉉上臺執政與韓日關係的退潮

盧武鉉上臺後，在對外政策上推行了務實均衡的外交政策。2003年6月，上任剛過百天的盧武鉉對日本進行了正式訪問，這是他繼美國之行後的第二次出訪，顯示了日本在韓國外交戰略中的重要地位。盧武鉉的訪日歸結起來有三大目標：

1. 正視歷史，吸取教訓，邁向未來。他在離開漢城啟程訪日之前說：「我是韓國第一位戰後出生的總統」，「我們不能總是被過去束縛住手腳，要正視歷史，吸取教訓，邁向未來」，表明盧武鉉將以一種新的戰略思想來處理與日本的關係。
2. 磋商解決朝核問題，堅持「和平解決原則」，呼籲日本不要採取「強硬措施」，

維護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雙方重申了有關「不能容忍朝鮮擁有核武器」、和平解決朝鮮核問題的原則立場，並沒有像韓美、日美首腦會談時那樣提及要採用「追加措施」或「強硬措施」。

3. 為把韓國建設成東北亞中心國家，加強與日本的經貿關係，是韓日首腦會談的重要議題。訪日期間，盧武鉉敦促日本擴大對韓投資，減少兩國間的貿易不平衡，並商討兩國締結自由貿易協定問題。

2004年7月，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對韓國進行訪問，在此次首腦會談中盧武鉉表示：「在本政府任期內不從政府角度提及歷史問題」。2004年12月，盧武鉉再次訪問日本。為了給韓日關係加溫，日本特意請韓國電視劇「冬季戀歌」而風靡日本的韓國影星裴勇俊到鹿兒島指宿市為峰會捧場。2005年恰逢韓日建交四十周年，雙方確定把2005年訂為「日韓友好年」，並安排了一系列的雙邊交流活動。

然而，韓日關係卻急轉直下。2005年3月16日，島根縣議會不顧韓國方面的強烈抗議強行通過「竹島日」條例。自「獨島」領土爭端爆發以來，兩國關係急劇惡化，靖國神社問題、教科書問題、「慰安婦問題」等歷史問題，與日本圖謀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朝核問題等現實問題，錯綜交織在一起，使韓日關係陷入建交四十年來的最低點。3月23日，韓國總統盧武鉉發表了《就韓日關係告國民書》，呼籲國民要不惜經濟代價準備同日本打一場「持久戰」。同年10月，韓國宣布凍結兩國首腦的「穿梭互訪」，對日和解政策出現全面倒退。2006年4月25日，盧武鉉總統再次就韓日關係發表「特別講話」，宣布：動員一切國家力量和外交資源「守護獨島領有權」。

此後，兩國不但沒有恢復「穿梭互訪」，反而繼續在領土和歷史問題上不斷發生摩擦。

可見，「歷史問題」和領土問題依然是橫亘在韓日之間的最大障礙。

李明博上臺執政與韓日軍事關係的提升

李明博上臺後，大幅調整盧武鉉的對日外交方針，兩國關係急劇升溫。在組建新政府時，李明博就選用大量的「知日派」人士。2008年4月，李明博訪問日本並與福田康夫舉行會談，雙方同意把兩國提升為「成熟的夥伴關係」，開啟日韓關係「新時代」。

然而，在韓日歷史問題上採取寬容姿態的李明博，卻不得不面對日本政府不顧韓方一再交涉、首次在文部科學省制定的《初中社會科教科書新指導綱要解說書》內，將獨（竹）島表述為日本領土。韓國媒體紛紛譴責日本「挑釁」和「背叛」。不僅如此，2008年版的日本《防衛白皮書》，增加了日本「固有領土——竹島的領土問題仍未解決」的內容。韓國政府向日本提出強烈抗議並召回駐日大使權哲賢，李明博的對日「現實主義外交」遭受重創。

儘管李明博執政以來雙方仍圍繞歷史問題和領土問題進行過激烈的較量，但是兩國關係卻「凍而不僵」、「鬥而不破」，體現了兩國處理棘手問題的外交智慧。2010年8月10日，日本首相菅直人不顧黨內外的反對，就《日韓合併條約》簽署100周年發表首相談話。儘管韓國民間認為，日本首相的道歉缺乏誠意，沒有提到對受害者進行賠償的內容，但是，日本能夠選擇此時機發表講話，可以說是有一定積極意義。

2011年10月19日，李明博總統會見了到訪的日本新任首相野田佳彥，雙方就發展面向未來的韓日關係、加強經濟合作等問題達成共識。當天，野田向李明博移交日方在殖民統治時期擄走的五卷古書，呼籲兩國發展「以未來為導向」的雙邊關係。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韓日之間的軍事交流日益密切。尤其是，「天安艦事件」和「延坪島事件」發生以來，朝鮮半島局勢持續緊張，美日、美韓間頻頻舉行各種形式的軍事演習，為美日韓三角關係的進一步強化提供了一個新的契機。

進入 2011 年之後，美日韓加強三邊合作的勢頭依然不減，韓日之間的軍事交流與合作更是緊鑼密鼓地展開，原本相對薄弱的韓日軍事合作出現了大有趁機強化之勢，以至於國際輿論紛紛作出日韓間或將建立實質性「同盟」關係的大膽預測。

評估與展望

近年來，日本刻意製造「韓國已不再提歷史問題」、「日韓歷史問題已經了結」的輿論。然而，周而復始的「教科書事件」、小泉任期內多達六次的參拜靖國神社事件、日本政要不時發表美化侵略歷史的「妄言」，以及在領土問題上的正面挑戰行為，已經嚴重傷害了韓國國民的感情，給韓日「新型夥伴關係」蒙上了濃重的陰影，並使兩國國民之間的感情呈明顯惡化趨勢。

儘管如此，日本仍想以所謂的「共同價值觀」為劃線，刻意採取「拉韓抑中」策略，試圖向中國打起「韓國牌」。其實，日本並不「看重」韓國，日本人對韓國人有一種心理優勢，「拉韓」是手段，「抑中」才是目的。

日本對韓國的拉攏難以成功，其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對朝鮮半島的戰略設想與朝鮮半島兩個國家的整體意願明顯對立。日本不希望看到朝鮮半島統一，似乎試圖朝鮮半島分裂永久化。在關乎民族大義與國家未來前途的大是大非問題上，韓國沒有與日本妥協的餘地。

歷史問題與戰略利益上的衝撞，構成了韓日關係的常量，它不可能因為日本在一些策略上的

改變而發生大的變化。在這一兩國關係長遠的結構性因素影響下，韓日關係難以有實質性改進，日本「拉韓抑中」的策略，也不可能阻止中韓不斷發展的友好合作關係。相反，中國與韓國在朝鮮半島統一、東北亞的穩定和中韓兩國經濟互惠等問題上，存在著廣泛的共同利益，在許多問題上也看法相近。提高中韓合作水準、密切中韓關係，在兩國之間已達成共識，它同樣成為了規範未來中韓關係的一個常量。

日韓兩國關係總體上仍然是「剪不斷，理還亂」，日韓之間除了歷史上積澱已久的根深蒂固的民族矛盾之外，還有現實的領土主權爭端。儘管兩國之間有著根深蒂固的感情糾葛和無法調和的領土爭端，但由於兩國畢竟同屬於美日韓「三邊兩同盟」框架內，且有美國這一「感情紐帶」和居中調解，加之兩國有著共同的「宿敵」，因此兩國出於各自的戰略利益考慮不致真的反目成仇，並引發根本性的衝突。首先，美國不願看到日韓關係全面崩潰，這不符合美國在東亞的安全戰略利益。其次，日本刺激韓國的做法不會無限度地延伸下去，這不符合日本在東亞的地緣政治利益。再次，日本和韓國有著共同的「宿敵」。日本將韓國作為抵禦「朝鮮威脅」的「緩衝地帶」；韓國則把日本作為牽制「朝鮮南侵」的重要力量。

總之，周而復始的「教科書事件」、日本政要不時發表美化侵略歷史的「妄言」，以及在領土問題上的正面挑戰行為，給日韓「新型夥伴關係」蒙上了濃重的陰影。韓日兩國要建立真正的「新型夥伴關係」，關鍵在於作為加害者的日本能否真正反省對韓國殖民統治的歷史，以取得韓國國民的信賴。毋庸置疑，韓日關係發展得比較成熟，雙方在歷史、領土等問題上「該計較就計較」，但不影響其他領域的交流。況且，維繫和發展同美國的同盟關係，進而維持美日韓三國協調體制，是韓日兩國對外戰略的核心和首要目標。

新時代的日臺關係與臺灣的日本研究⁺

川島真^{*}
廖欽彬^{**}譯



日本與臺灣近年來一直在摸索彼此關係的強化與新結構的建立。在 1972 年斷交以來的七二年體制裡，亦能看到調整的可能性。在 1972 年的斷交之際，兩國決定維持透過交流協會與亞東關係協會的經濟文化交流。雖然沒有高層次的政治性交涉，但透過議員外交等，各種關係仍然一直被維持著。具體的案件處理，則以經濟貿易會議為中心在進行。

1990 年代以來，日臺關係以臺灣的經濟發展與民主化，或是日本對中情感的變化等為背景，急速地在密切化。也因此雙方的國民情感特別好。在這種情況下，2009 年臺灣方面提出臺日特別夥伴關係促進年。此文書亦包含在安全保障方面的對話，雖然沒有採取日臺雙方的共同文書形式，但工作假期（Working

Holiday）、羽田—松山的通航，以及現在仍一直持續在議論的故宮博物院文物在日本的展示等，這一連串的事業一直在推展中。

另一方面，2010 年交流協會和亞東關係協會之間，締結了「關於 2010 年之強化臺日交流合作的備忘錄」，彼此約定 2011 年還會繼續下去。此文書可以說是 1972 年斷交以來最初的正式（比較高層級的）共同文書。此文書一方面避免和經濟貿易會議的管轄內容有重複，另一方面試圖將「在海上安全與秩序的維持上，盡可能促進日臺之間的交流與合作」的條文（第四條）等，以及欲將日臺關係置放在區域合作架構下的各種內容納入其中，實是意義深遠。另外，同樣在 2010 年，雙方還締結了「關於土石流災害防止等的決策」等，這突

⁺ 本文係 2011 年 11 月 29 日本院人文社會科學討論會內容。

^{*} 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副教授。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顯出實務層級的交流正在被「制度化」當中。接著，在經濟方面，日本企業對 ECFA 的期待逐漸升高，看準中國市場，或者是看好作為生產據點的中國的日臺企業，彼此間的合資與合作等相繼在出現當中。

如此看來，我們可以說日臺關係雖然處在沒有邦交的狀態中，但在各方面的合作關係，卻一直不斷地被推動。然而，由於沒有邦交，因此要進行關於高層級的政治、外交、軍事、安全保障關係的對話與交涉，是非常困難的，而此情況逐漸提升彼此間的壓力，卻也是不爭的事實。從 2009 年到 2010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姿態有一定的變化，另外，美國的對外政策亦有緊縮的傾向。關於日美同盟的將來，開始不斷傳言會有各種可能性發生。為了因應這種國際環境的變化，日臺關係也可以說正在迎接新的階段。

在這種新時代的日臺關係裡，有各種課題被預期，作為國民層級的問題，相互認識的更進一步深化，也變成了課題。這是關於日臺雙方所能說的事情。日本和臺灣存在著戰前以來的特殊關係，而且在戰後又有關於「二個中國」的問題存在，因此若在日本國內講「臺灣」的話，通常都會牽涉到政治性的議題。在此情況下，實在有必要將臺灣認識標準化或常態化。關於這一點，1990 年代成立的日本臺灣學會，開始在日本將學術性研究「臺灣」的環境普及化。在這十年之間，關於臺灣研究的實證性博士論文、著作產量非常的大，其結果，「論述臺灣」的政治性意涵，也相對地逐漸在減弱。然而，即使如此，厭惡中國的情感卻和親近臺灣的情感形成表裡一體的關係，另外，肯定日本殖民地統治的言論，也可以在和臺灣的關連之中看到。日臺之間的學術交流，在這十幾年裡呈現出極為熱絡化的景象，不僅超越日本的臺灣研究與臺灣的日本研究之間的交流，還在廣泛的領域當中被推展。

另一方面，在戰後的臺灣，對參與抗日戰爭的中華民國而言，「論述日本」這件事，政治性意味就非常的濃厚。另外，又因為有批判日本的公眾言論出現，所以在從 1980 年代末期開始的民主化、臺灣化過程裡，能夠看到肯定日本言論的種種現象。報告者受交流協會的委託進行調查，並以此調查為基礎，在 2004 年出版了《臺灣的日本研究》這本書。報告者在此著作中指出臺灣日本研究的形成背景及其課題。當時交流協會已經有許多關於日本語學、日本語教育學的調查報告，因此要求報告者的是，日本語學與日本語教育學以外的領域之調查。報告者在結果中指出，臺灣日本研究的最大課題是，培養從碩士課程到博士課程之研究者的體系尚未形成，因此在社會科學、人文科學領域中的「日本研究」在臺灣內部難以培養成等。

另外，進入二十一世紀後，過去在日本統治時代受日本語教育的世代，急速在高齡化，這也給予了日臺之間的相互認識很大的影響。在日本人的臺灣認識裡，前總統李登輝的印象雖然非常的強烈，但像那種對日本擁有特殊情感的臺灣人，正在急速減少當中。此外，扮演兩國之間媒介角色的他們急速在高齡化，這對日臺關係本身，同時對臺灣的日本認識將會給予直接的影響。

在這種認知底下，交流協會把 1995 年以來一直維持下來的和平交流事業經費等做了一些調整，將以前日臺之間歷史研究者交流的經費等拿來充當對臺灣日本研究的支援。此外，臺灣的日本研究專家亦組織學會等，在政治大學設有日本研究的碩士學程，還有以臺灣大學等為中心也即將設置日本研究據點等，對在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領域中培養日本研究者的要求，也有新的動向。這是一件值得歡迎的事。

在這種新時代的臺灣日本研究當中，將成

為課題的有以下幾點：

1. 語學出身的學生，或者是日語訓練出身的學生各自發揮其專長，以學術的角度來研究「日本」，並創造出能將其成果傳播出去的環境。
2. 一方面汲取日本的日本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同時在世界的日本研究中建立「臺灣日本研究」的獨特性。
3. 各據點應該同心協力來形成為了達成這些目標的制度，或者是學術資源等。此外，日本方面亦應該針對這些動向，在意識效率的情況下，做適切的協助。

臺灣大學是臺灣的最高學府，在其內外的影響力非常大。因此日本研究據點的形成具有很大的意義。報告者所屬的東京大學和臺灣大學有姊妹校關係，個人認為東京大學方面也應該盡可能地來協助臺灣大學的日本研究據點。

【多元觀點】

魏晉玄學宇宙本體思想的邏輯演進⁺

康中乾^{*}



與漢代的宇宙發生論相比，魏晉玄學是宇宙本體論。玄學是怎樣來建構宇宙本體論的呢？玄學思想的開端是正始時期以王弼為代表的「無」本論。王弼為什麼要提出「無」？其實，這個「無」是對《老子》「道」本論思想發揮的結果。王弼注《老》時既然繼承了老子的「道」本論思想，又為什麼講起了「無」？「無」與「道」究竟有什麼關係呢？原來，「無」是對「道」的哲學性質的一種規定和定調。因為，當王弼承繼了老子的「道」本論後，意識到這樣一個問題：「道」為什麼能作天地萬物的本體？它有什麼資格、具備有什麼特性而使得它能作為本體呢？王弼發現，「道」要能作為本體，必須具備抽象性、普遍性、一般性之特性，即必須是個「一」。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說：「無形無名者，萬物之

宗也。不溫不涼，不宮不商。聽之不可得而聞，視之不可得而彰，體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嘗。〔……〕故能為品物之宗主，苞通天地，靡使不經也。」可見，要作天地萬物的本體、本原，只有抽象的「一」可以做到。所以，王弼意識到，「道」要作天地萬物之本，就首先應該具有抽象性之特性，即無形無狀無名無象，因為無形才能形天下之形，無狀才能狀天下之狀，無名才能名天下之名，無象才能象天下之象。這個無形無狀無名無象，就簡稱為「無」。可見，「無」就是「道」，是對「道」的抽象性的哲學性質的指稱、定調。

「無」作為本體，應是抽象性的。但它既然是本體，就又不能離開天地萬物之具體存在。所以，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講了前面我

⁺ 本文係 2010 年 11 月 2 日本院訪問學者學術交流會所發表之論文摘要。

^{*} 陝西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

們所引的那一段話後，接著說：「然則四象不形，則大象無以暢；五音不聲，則大音無以至。四象形而物無所主焉，則大象暢矣；五音聲而心無所適焉，則大音至矣。」這是說，「無」作為本體要能真正起作用的話就必須與具體事物相關係。所以，在注《老》時，王弼既講「以『無』為體」，又講「以『無』為用」。就這樣，王弼的「無」論中蘊涵有抽象性與具體性的內在矛盾。而恰恰是「無」自身的這一內在矛盾，才成為魏晉玄學之思想演化的內在動力。

「無」的抽象性之維度被展開和落實後，就向人的純精神自由方面趨進，承接此演進趨勢的是竹林學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自然」論。無論竹林學玄所「任」的這個「自然」是什麼，但當徹底拋開「名教」而純任「自然」時，這個「自然」就只能是人的一種純精神境界，這在哲學性質上就是「至無」、「虛無」。這裡就將「無」論中抽象性的維度推向了極端。

而「無」的具體性維度被展開和落實後，就轉到了眾有的現象界，這就是裴頠的「總混群本，宗極之道」的崇「有」論。「有」論對現象界之眾有何以能有的條件性作了探討，即發現和提出了一有與他有之並存的存在構架，這是它的重要思想貢獻。但在眾有中，一有與他有均為具體的存在者，這樣的「有」何以能作本體呢？裴頠的「有」論沒能解決這個矛盾。實際上，裴頠的崇「有」論是將王弼「無」論中具體性的維度推向了極端。

所以，竹林學玄的「自然」論和裴頠學玄的崇「有」論只是將王弼「無」論中抽象與具體的矛盾開展了，但並未能解決這一矛盾。對這一矛盾的化解是郭象玄學的任務。當郭象從事玄學理論沉思時，明確考察了究竟什麼能作本體的問題。他對以前的「無」本論和「有」

本論均作了深思，認為「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物眾形。」（《莊子·齊物論注》）這就既否定了「無」本論又否定了「有」本論，認為單純的「無」和單純的「有」均無資格作本體。當然，當郭象在此說「無」時，這個「無」已與王弼的「無」相去有間，它是經過竹林學玄的「自然」論過濾過的「至無」。既然單純的「無」和「有」均不能作本體，那怎麼辦呢？郭象提出了「獨化」論。「獨化」論的提出，的確反映出一種無可奈何的心情。但「獨化」論則正好將其前的「無」與「有」整合、統一了起來，使之成為一「有一無」性而成了「獨化」的內在結構。所以，具有「有一無」性之內性的「獨化」，就是宇宙之存在的真正本體。魏晉玄學發展到郭象的「獨化」論，就邏輯地完成了關於宇宙本體論的建構任務。

【計畫近況】

東亞儒學研究計畫⁺

計畫總主持人：
黃俊傑^{*}

總計畫

本計畫延續 1998 年以來各階段的研究，以東亞為研究之視野，以儒家經典為研究之核心，以文化為研究之脈絡，聚焦東亞各地文化之互動，並在上述脈絡中探討儒家經典與儒家價值理念之變遷及其展望。

本計畫首要之研究目標在於建構本校成為國際及漢語學術界「東亞儒學」研究之重鎮，並致力於在二十一世紀文明對話新時代中，深入發掘東亞文化的核心價值，在東亞儒學研究上推陳出新，開創新局，使本校成為「東亞儒學」研究之重鎮。

分項計畫

東亞儒學史中孔子形像與解釋之變遷及其思想史的涵義

孔子形象之建構與變遷，係東亞各國思想與文化變遷之溫度計，既顯示東亞各國歷史之轉捩點，又體顯東亞各國儒家「道統」與「治統」之不可分割性、互為緊張性及其不穩定之平衡性。本研究以「孔子形象」之變遷作為研究主軸，可以深入分析東亞各國思想之升沉與世運之興衰。

李退溪與東亞儒學

本研究擬以五年為期，研究韓國大儒李退溪（名滉）的儒學思想及其思想與東亞儒學的關係，除探討李退溪對朱子思想的繼承與發展、

⁺ 本計畫係本校執行第二期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之校內拔尖研究計畫之一。

^{*} 臺灣大學特聘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本院院長。

對陽明學的批判，並探討退溪學在東亞儒學史的意義和地位。

東亞儒學視域中韓國朱子學與陽明學之交涉

在朝鮮儒學的發展史中，朱子學享有權威地位，陽明學則始終受到排斥。即使朝鮮的朱子學者不接受王陽明的觀點，他們仍須面對王陽明所提出的問題，故在朝鮮儒學的實際發展中，陽明學的觀點仍然不斷滲透於各種論辯之中。本研究即透過對若干人物與問題的研究，來探討朱子學與陽明學在韓國儒學中的交涉，以期有助於深入了解韓國儒學的問題與發展。

東亞儒學視域中的身體與工夫：以變化氣質說為線索

本研究主要探討東亞儒學中的變化氣質說。先以宋明理學為核心，探討伊川、朱子、陽明、蕺山等人變化氣質說的內涵，後以日、韓儒學為中心，探討中江藤樹、山崎闇齋、李退溪、鄭齊斗等人在變化氣質說上的特殊之處。最後則分析東亞儒學中有關身體論與工夫論的幾種主要類型，並探討東亞儒學之身體論與工夫論的內涵。

東亞儒學視域中朝鮮儒者丁若鏞與越南儒者黎貴惇的經世學思想

本研究擬由探究朝鮮儒者丁若鏞與越南儒者黎貴惇的經世學思想，企圖呈顯東亞儒學的同質性與地域的異質性，一方面也想藉由這樣的討論，探究儒學在面對西學時，如何產生具有現代性的思考，而可有其有別於西方現代性的發展。

近代日本新學問的形成與傳統儒學思想的轉化

本研究探討阪谷朗廬、中村敬宇、岡倉天心、津田左右吉、和辻哲郎等五位跨越德川幕末及明治時代的知識人之思想體系，以及他們對傳統儒學思想價值的認知，論述東西文化融和的重要性。

計畫執行近況

本計畫於本季共召開三次會議：

「東亞視野中的保釣運動」研討會暨釣魚臺珍貴資料展

時間：2011年12月18日

地點：臺大農化新館五樓第四會議室

第一場：保釣運動的意義：全球、東亞與臺灣

主持人：王曉波（世新大學教授）

引言人：劉源俊（中華保釣協會理事長、東吳大學物理系教授）

李淑珍（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史地系副教授）

鄭鴻生（作家）

孫若怡（元培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毛鑄倫（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師）

第二場：綜合討論：保釣運動的啟示

主持人：王曉波（世新大學教授）

引言人：夏鑄九（臺灣大學城鄉所教授）

林深靖（浩然基金會研究員）

藍博洲（作家）

東亞儒學研究計畫協調會議

時間：2012年2月12日

地點：福華文教會館一樓大廳

與會者：伍振勳、李明輝、林維杰、唐格理、張崑將、陳昭瑛、黃俊傑、蔡振豐

東亞儒學研究計畫叢書編輯會議

時間：2012年2月12日

地點：福華文教會館一樓大廳

與會者：陳昭瑛、黃俊傑、蔡振豐

【計畫近況】

東亞民主研究計畫⁺

計畫總主持人：
胡佛^{*}、朱雲漢^{**}

總計畫

本計畫為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2005 年創立時四大核心研究計畫之一，由國內績優研究團隊結合東亞十三個國家與地區的研究團隊以及國際頂尖學者組成，針對東亞地區威權政體轉型與民主化的機制與過程，進行長期性追蹤研究，累積具豐富理論意義且系統化的實證資料，與其他地區民主轉型進行比較研究，並推動全球民主化研究理論的演進。

本計畫以「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為骨幹，協同東亞各國團隊發展有效解釋本地區政治價值變遷，政治正當性來源、政體轉型經驗的理論架構，並定期針對東亞各國公民的政治價值、政治支持、政

體表現與治理品質評價，及政治參與進行同步調查。本計畫為「全球民主動態調查」（Global Barometer Surveys）的核心成員，承擔相當比例的全球營運總部功能，全面開展全球範圍的民主化比較研究，並與相關重要國際組織進行長期性合作。

分項計畫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區域調查計畫

本計畫承擔「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區域總部的功能，負責東亞十三個國家與南亞五個國家調查的整合。對亞洲的民主轉型、鞏固與運作的經驗進行系統性研究，研究架構同時納入比較政治理論的四個典範：「現代化 / 後現代

⁺ 本計畫係本校執行第二期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之校內拔尖研究計畫之一。

^{*} 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特約研究員、中央研究院院士、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

^{**}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特聘研究員、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合聘教授、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化理論」、「新制度論」、「政治文化理論」，以及「理性選擇理論」。第四波調查並將深入探討「東亞例外」的理論爭論，並分析傳統文化、國家機構治理能力、經濟社會現代化，以及國際環境等因素對東亞政體轉型的影響。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臺灣地區調查計畫

本計畫配合東亞區域調查計畫的共同研究架構，並針對臺灣、香港、新加坡與中國大陸等華人社會比較研究架構，以及臺灣特殊歷史情境與政治發展軌跡進行規劃。臺灣調查配合東亞區域調查的時程，定於2013年執行。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大陸地區調查計畫

本研究是全球唯一長期追蹤大陸地區公民價值變遷與政體評價的調查計畫。在理論發展及研究設計部分，除了配合東亞區域計畫的共同研究架構外，並將針對兩岸三地的比較研究架構，以及中國大陸特殊的政治發展經驗進行規劃。大陸調查配合東亞區域調查的時程，定於2013年起執行。

全球民主動態調查計畫

本研究整合全世界五個大型區域調查計畫，成為一個涵蓋超過七十個國家的全球性民主化調查研究組織。在此架構下，開展與世界銀行、聯合國開發總署、「國際民主與選舉支援機構」及其他重要國際組織的長期合作關係，定期收集與建構全球範圍的民主發展與治理品質指標，並合作發表權威性的調查研究報告。

政治體制、族群關係與政體評價

本研究結合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跨國資料，以及晚近有關族群關係的理論議題，並於全球民主動態調查的合作平臺上，深入而系統性地探究不同族群團體與制度設計間的關係。

自由貿易、政治體制與治理品質

本研究結合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跨國資料以及晚近有自由貿易與治理品質關係的理論議題，發展完整的測量指標，並對照各國實質的貿易數量和主要進出口產業，發展出自由貿易對於民主政治影響的基礎性資料庫，並以此延伸為分析自由貿易協定和治理品質的先驅性跨國比較研究。

計畫執行近況

1. 東亞民主研究計畫主持人朱雲漢教授於2012年1月16日至19日，赴美國華府與「美國民主基金會」成員討論共同主編之「民主在東亞」英文專書章節修改與出版計畫事宜。

2.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主持人朱雲漢教授2012年2月14日至18日赴印度德里「發展中社會研究中心」(CSDS)，參加「南亞民主動態調查」規劃會議。

3.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第三波臺灣調查核心問卷及臺灣特有題資料已於2011年12月正式釋出，相關詳情及資料申請可查閱本計畫網站：<http://www.eastasiabarometer.org>。

【計畫近況】

東亞華人自我的心理學研究計畫⁺

計畫總主持人：
黃光國^{*}

總計畫

本計畫係針對西方心理學研究之偏頗而發，規劃以東亞華人的「自我」為研究焦點，以「關係主義」作為預設，建構一系列的理論，取代西方「怪異的」心理學理論，來解決本土社會的問題。本計畫將以東亞華人的「自我」之研究作為基礎，一面推展華人本土心理的理論建構及實徵研究工作，一面擴大對國際本土心理學社群的影響力，希望能為非西方國家的本土心理學開闢出一片新的研究領域。

分項計畫

華人的倫理自我

本研究企圖探討華人的倫理價值，如何透過家庭教化影響華人自我發展的歷程，包括儒

家倫理價值的現代性、自我修養觀與人際寬恕、價值衝突與矛盾接受性等相關議題，用以闡明黃光國所提出之自我曼陀羅模型（Mandela model of self）中，文化價值與個人行動智慧之間的相互衍生關係。

讓孩子成為一個真誠的自我能動者：個體化與關係自主性發展的影響來源

過去雖有探討如何培養青少年「個體化」與「關係」這兩種自主能力發展的零星研究，但仍欠缺在整合個人性格特質、家庭與學校等脈絡因素之理論架構，有系統地探討影響青少年自主性發展的來源因素。本研究目的即欲採取縱貫式研究設計及多元層次統計分析策略，細緻地探討有利於青少年這兩種自主性發展歷程中的重要影響來源。

⁺ 本計畫係本校執行第二期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之校內拔尖研究計畫之一。

^{*} 臺灣大學心理學系講座教授、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華人組織中的個體我與集體我：組織認同的構念、形成及效果

本研究探討華人關係主義下，華人組織內的個體我與集體我間究竟具有何種錯綜複雜的關係。針對此一目的延伸出來的問題，包括：集體我的形成歷程、個體我融入組織或集體我的歷程，以及個體我與集體我間的契合效果等。

自我、人我、天人：華人文化脈絡下大學生生涯建構歷程研究

本研究為深具發展潛力的原創性研究，一方面可以建構具本土意涵的生涯發展理論，深化對華人文化脈絡生涯發展的認識；另一方面亦期能與現有之西方生涯發展理論對話，並補足西方生涯理論之不足，為生涯研究開創新的研究視域。

計畫執行近況

子計畫一：華人的倫理自我（主持人：黃光國、黃曬莉）

本院「東亞華人自我的心理學研究計畫」子計畫「華人的倫理自我」共同主持人黃曬莉教授於3月16-17日，應邀出席世新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社會心理學學系（Department of Social Psychology, Shih Hsin University）主辦之「社會學與心理學的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人際關係與社會互動」（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 Social Interaction），會中擔任論壇演講人，演講題目為：〈名分及情感：華人人際關係之新倫理〉。

子計畫二：讓孩子成為一個真誠的自我能動者：個體化與關係自主性發展的影響來源（主持人：葉光輝）

1. 本計畫項下的四個分項第一年的研究計畫案，皆已經通過國立臺灣大學行為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的審查核可執行。

2. 2012年2月24日，計畫總主持人黃光國教授應邀至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給予「建構含攝文化之心理學理論在全球化時代的意義」專題演講，闡述本研究計畫案核心理念，藉以推展華人本土心理的理論建構及實徵研究工作，尋求雙方未來進一步研究合作的可能性。

3. 2012年3月14日，分項計畫主持人葉光輝教授獲聘擔任司法院司法人員研習所講座，於「101年庭長、法官家事專業課程」上介紹推廣華人本土心理學在家庭教化及親子互動的研究近況與心得。

子計畫三：華人組織中的個體我與集體我（主持人：鄭伯璜）

本子計畫邀請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管理學院副教授 Margaret Shih 來臺大進行短期訪問，時間由2012年2月1日至4月30日；亦邀請曾擔任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任心理系系主任長達十年的 Prof. Julius Arthur Woodward 來臺大訪問一年，並開授英文學術寫作課程。另外，主持人亦獲邀於2011年12月分赴中國科學院與中國人民大學演講，講題分別為「組織創新」與「領導者的品德」。

子計畫四：自我、人我、天人：華人文化脈絡下大學生生涯建構歷程研究（主持人：王秀槐）

本研究第一年進行紮根性基礎研究，探究、解析華人文化脈絡下，大學生對於「生涯」一詞所抱持的概念。由於臺灣生涯輔導發展的理論實施主要基於西方的理論思維與文化派典，「career」雖被直譯為「生涯」，在中文中卻找不到一個完全對等的詞語可以體現其概念。雖然生涯輔導教育與諮商早在四十多年前已在臺灣開始拓展，國人對生涯所指稱的概念範籌，以及我們的文化脈絡到底對於生涯賦予了什麼多面的義涵，在生涯這個概念的大傘

下又含括了哪些核心及基礎概念，卻少有系統性的探究。故此，本研究之目的在解構生涯的概念結構與核心類別，了解各個含涉概念的縱向（階層性）與橫向（成份性）的結構形式與內涵，以釐清基礎觀念，劃定概念界域，如此將有助於為本土生涯理論的發展提供一個概念性架構，為生涯輔導與諮商提供具體的工作方向。

【計畫近況】

東亞法院與法律繼受研究計畫⁺

計畫總主持人：
葉俊榮*

總計畫

東亞法院之間如何互動與相互影響，對於東亞民主理念與法治主義的發展，具有學理上的重要意義。本計畫希望結合多位不同法學領域的學者，以法院功能的演變與發展為經，以法律的繼受與發展為緯，以法院的功能為核心，共同探討東亞的司法實踐與理論發展，並進一步掌握臺灣法院與法文化在東亞的網絡定位。

本計畫的範疇除了臺灣以外，包括韓國、日本、中國（包括香港）、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與越南等，涵蓋具有代表性的法律繼受背景、政治社會結構、發展型態的國家，在議題內涵上則以法院與法律的社會承擔、民間信賴、正義實現效能，以及國際化為重點。

分項計畫

東亞憲法法院角色的演變與社會對話

本研究延伸東亞憲政主義的討論，探討憲法法院所反映的歷史及社會脈絡，包括過去歷史遺留、社會現實以及社會需求等。

東亞經濟法的繼受與發展： 以經濟法制發展為核心

本研究從法院的組織與程序、法院的經濟管制功能與法院的國際化等面向對東亞的經濟法制發展進行探討

東亞法院的民事紛爭解決： 東亞民事程序法制的繼受與變革

本研究以東亞民事程序法制之繼受、變革及發展為主軸，分別探討民事程序制度之四大

⁺ 本計畫係本校執行第二期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之校內拔尖研究計畫之一。

*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特聘教授、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領域，涵蓋民事訴訟程序、法院對於裁判外紛爭處理程序之支持與監督、家事事件程序及債務清理程序（以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為中心）。

東亞法院的治理功能： 從發展型國家到管制型國家

東亞國家已遠離「發展型國家」的脈絡，但以經濟為主軸的發展方向並未改變，面對全球化的激烈競爭，國家發展經濟的壓力不減反增。本研究將在此背景下探討東亞各國法院的治理功能，包括東亞法院初步展露的管制型國家特色是否為真、東亞法院的表現與其他管制型國家是否有所不同等。

東亞民法的理論繼受與法院實踐

本研究希望探尋東亞各國對於歐陸民法的理論繼受在法院的實踐過程，甚至東亞各國彼此間民法理論之繼受與實踐過程中，出現的「去時間化的意義變遷」。特別著重在觀察東亞各國繼受之民法理論與固有法制間的異同，以及東亞法院如何進行融合與續造，承擔法律的社會規制責任，進而發展出屬於該國本土特色的繼受成果，藉以探求東亞區域民法的差異及整合或統合的可能性。

計畫執行近況

本計畫之執行近況可至本計畫部落查詢
<http://eacourt.blog.ntu.edu.tw>。

東亞法院論壇系列（四）

東亞法院的民事紛爭解決：東亞民事程序法制的繼受與變革

時間：2011年12月21日

地點：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實習法庭

主持人：林仁光（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主講人：沈冠伶（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

與談人：呂太郎（司法人員研習所所長）

東亞法院與法律繼受學術研討會

日期：2012年3月2日

地點：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多媒體室

內容：

本計畫2012年3月2日舉辦東亞法院與法律繼受學術研討會，由計畫成員就計初步成果進行報告研討，並邀請前司法院院長翁岳生教授與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黃俊傑教授擔任開幕致詞。

報告主題包括東亞法院的三種模式（葉俊榮教授）、東亞經濟法的繼受與發展（林仁光教授）、東亞法院的民事紛爭解決：以臺灣民事法院為例（沈冠伶副教授）、東亞變遷脈絡下的家庭法制發展：以臺灣與南韓為主的初步分析（李立如副教授）、東亞民法的理論繼受與法院實踐（吳從周助理教授）、行政法院的治理功能：東亞視野與臺灣觀點（張文貞副教授）。

與會的學者尚包括蔡明誠教授、王泰升教授、王文字教授、邵慶平副教授、許士宦教授、詹森林教授、郭書琴副教授、邱琦法官、許宗力教授、黃丞儀助研究員等。

東亞法院課程

於2011年第二學期開設東亞法院課程，由計畫成員共同授課。

未來三個月學術活動預告：

Conference of Asian Courts in Context 國際學術研討會

日期：2012年3月22日

地點：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第一會議室

內容：本研討會邀請包括臺灣、韓國、日本、新加坡、韓國、中國、越南、馬來西亞、印尼、斯里蘭卡、孟加拉、馬來西亞、蒙古等國學者就其各國法院的制度與運作情形進行報告與研討。

東亞法院論壇系列（五）

日本最高法院近十年來的發展

日期：2012年3月22日

主講人：川岸令和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學）

東亞法院論壇系列（六）

變遷中的家庭與法院

日期：2012年3月16日

主講人：李立如（中原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東亞法院論壇系列（七）

東亞法院與經濟法之發展

日期：2012年4月11日

主講人：林仁光（臺大法律學院教授）

東亞法院論壇系列（八）

東亞民法的理論繼受與法院實踐

日期：2012年5月9日

主講人：吳從周教授

東亞法院論壇系列（九）

東亞法院對於老年社會的因應

日期：2012年6月6日

主講人：簡資修教授

【計畫近況】

東亞國家的貿易、勞動、金融 與生產力研究計畫⁺

計畫總主持人：
劉錦添^{*}

總計畫

延續第一期「全球化研究計畫」，本計畫將繼續探討全球化對臺灣的影響。不過本次重點將聚焦至東亞各國，將臺灣與東亞區域的互動作為全球化下的一個重要面向加以討論，此一研究上的聚焦原因有二：首先是希望藉由與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其他東亞相關研究在地理區位上的重疊，能在不同學門間產生跨領域的對話。再者，雖然全球化在概念上並未有疆域的限制，但是由於交易成本的影響，每個國家與相鄰區域的互動，顯然占了全球化活動中相當高的比例。而臺灣與東亞各國的互動，正是屬於此一範圍。

分項計畫

1. 東亞國際婚姻移民對臺灣的衝擊
2. 臺商在中國投資的區位選擇（劉錦添）

本研究第一部分係利用臺灣的個體資料庫，探討外籍新娘引進對臺灣婦女的結婚、離婚、生育行為與就業市場的衝擊。第二部分則利用臺灣經濟部對外投資登記的原始檔案，探討 1991 至 2006 年，臺商至中國各省投資的區域選擇。

全球化下的貿易型態（陳虹如）

本研究利用一個具有外國直接投資、國際委外代工和技術累積特性的南北國產品週期的模型，來探討全球化生產模式對產品研發、技術累積、所得不均和生產模式的影響。

⁺ 本計畫係本校執行第二期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之校內拔尖研究計畫之一。

^{*} 臺灣大學經濟學系特聘教授、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全球化對個人幸福感、工資與所得不均與生育率的影響：從亞洲與臺灣的切入（林明仁）

本研究利用 AsiaBaromete 計畫資料，分析全球化時代影響個人幸福感的幾項原因，並討論東南亞外籍勞工的引進，對臺灣的勞動市場與所得分配的衝擊。

全球化對臺灣民眾政治經貿態度與媒體產業的影響（江淳芳）

本研究將延續第一階段全球化的問卷調查，調查臺灣民眾對自由貿易與外來勞工的態度，並檢驗民眾的國家認同與經貿態度之間的關係。

全球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一個人口外移的實驗（王道一）

本研究利用經濟學這幾年最新發展的實驗經濟學的方法——「最不努力賽局」（或稱「最弱環節賽局」）的實驗來研究不同移民政策的效果，針對人才的國際移動進行實驗。

東亞各國的經濟成長與收斂：固定效果混合隨機邊界模型的估計與檢定（王泓仁）

本研究以一個具固定效果之長期追蹤資料混合隨機邊際模型（mixture panel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 with fixed effects）估計東亞各國的成長收斂情形及檢驗收斂的集團特性，以此作為探討區域整合的基礎。

1. 政治關係與公司信用評等：中國、臺灣及東亞各國比較
2. 企業社會責任和廠商績效：亞洲四國五區域的比較（沈中華）

本研究前三年在探討政治關聯性是否會影響信用評等，樣本來源為中國、臺灣及東亞等國的公司。後二年則設定兩項研究目標：一是利用亞洲五個區域，包括中國，日本，韓國，香港和新加坡在銀行、保險和非銀行機構的數據來探究企業社會責任的決定因素；二是檢視

企業社會責任和財務績效對在東亞五區的公司之間的關聯。

計畫執行近況

子計畫一之協同研究人員，美國 University of Houston 助理教授 Elaine M. Liu，於 2011 年 12 月 18 日至 29 日來臺參訪，並與計畫主持人劉錦添教授商討研究細節及進度。

子計畫一主持人劉錦添教授參加 2012 年 3 月 16 至 17 日於淡江大學舉行的 2012 年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de, Industrial and Regional Economics, 發表 "Are FDI in China Substitutes or Complements to Parent Firm Export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aiwa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子計畫四主持人江淳芳助理教授至德國 University of Duisburg-Essen 進行為期半年（2012 年 1 月至 6 月）的學術研究。

子計畫五主持人王道一副教授參加 2011 年 12 月 1 至 3 日於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舉行的 2011 Symposium on Experimental Econom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EEDEC) 學術會議，研討經濟發展領域頂尖研究者於發展中國家進行之隨機實驗。

子計畫六主持人王泓仁教授於 2012 年 1 月 6 日至 8 日在美國芝加哥舉行的 Allied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中發表 "Consistent Estimation of the Fixed Effects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

此外，本研究計畫人員近期已出版或已被接受之研究成果如下：

- (1) Jin-Tan Liu, Meng-Wen Tsou, James K. Hammitt (2012),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Taiwanese Adoption Data," *Economics Letters*, 115, pp. 134-136.

- (2) H.-J. Chen (2011), "Social Status,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and the long-run Effects of Money," *Journal of Economics*, forthcoming.
- (3) Chun-Fang Chiang, Brian Knight (2011), "Media Bias and Its Influence: Evidence from Newspaper Endorsements", accepted b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計畫近況】

東亞崛起中當代中國大陸的發展變遷 與「中國研究」主體性的轉換研究計畫⁺

計畫總主持人：
石之瑜^{*}

總計畫

本計畫為期五年，以本校社會科學院中國大陸研究中心作為執行單位，由趙永茂院長偕同中國大陸研究中心執行長徐斯勤共同規畫。

本計畫包括五個子計畫，整合了本校社會科學院的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社會工作四項不同的學門專長，以各子計畫主持人既有的關於中國大陸之研究取向為基礎，而與高研院的東亞文明總體計畫旨趣相互銜接配合。主要目的，在於同時強調當代中國大陸的實存客觀發展與變遷，以及研究社群在主觀上如何去理解研究中國時所顯現出的特質乃至問題，如何去影響了研究中國大陸實存發展的科學性或貢獻和價值。

分項計畫

公共治理中國家與社會的合作與競爭：
海峽兩岸的當代比較分析

本研究以五年為期，每年選取臺灣與中國大陸各一個地方公共治理的案例，來比較兩岸之間的「國家」部門與「社會」部門當面對不同的「結構」層面條件及「行為者」層面條件時，彼此之間如何產生不同的合作和競爭關係，以及這些呈現多樣性的互動關係，如何在不同的治理議題之間，以及在海峽兩岸之間，呈現出治理結果與影響上的「共同性」與「差異性」。

中國研究的知識策略及其文明構成：
在地學術世界的多點追蹤

本研究藉由各種具備世界在地性的文本所

⁺ 本計畫係本校執行第二期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之校內拔尖研究計畫之一。

^{*}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講座教授、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體現的差異，蒐羅中國研究的知識史中關於文明過程的困境與機緣，整理其中的限制和可能性，以及因此所醞釀出尚不為人知的諸多全球意象。

臺灣企業與中國企業生產力與創新能力及其比較分析之研究

本研究探討臺灣與中國加入 WTO 後，影響中國大陸製造業廠商勞動生產力與總要素生產力及創新活動的因素，以及影響臺灣廠商生產力與創新活動的影響因素。

東亞福利體制中的兩岸三地福利改革比較

本研究以五年為期，比較研究兩岸三地的社會福利改革經驗，並探討其在東亞福利體制與中國福利研究兩個研究傳統中的理論與經驗意涵。

宗教搭臺，政治經濟唱戲？——中國大陸「宗教觀光旅游」的社會學考察

本研究透過理論探討與經驗研究雙重策略，五年內針對宗教旅游現象逐一探究，並與大陸方興未艾的「紅色旅游」、「黑色旅游」與「綠色旅游」作一比較，立基在韋伯（Max Weber）學派的多元因果觀，深入分析宗教旅游所體現的「宗教力」與「文化力」，在中共「政治力」與「經濟力」雙重控制下，是否有突圍發展，確立自己的「固法則性」與主體性的可能性。

計畫執行近況

分項計畫執行近況

（一）中國研究的知識策略及其文明構成：中國學知識社群資深中國學者口述歷史

時間：2011 年 12 月

受訪者：德國 Erlangen-Nuremberg 大學 Michael Lackner（朗宓榭）教授

訪談者：石之瑜教授

時間：2012 年 1 月 5-8 日

受訪者：南加大名譽退休教授 John Wills 與荷蘭萊頓大學教授 Leonard Blussé。

（兩位世界知名的中國海運史專家，運用荷屬東印度公司的材料研究中國的航運史）

訪談者：石之瑜教授

（二）《中國研究的知識策略及其文明構成》系列出版

12 月出版：中國學的知識社群歐美系列 5 《鬧劇或悲劇？Maurice Meisner 眼中的中國》；中國學的知識社群臨邊系列 2《恢復朝貢體系中的主體性——韓國學者全海宗與李春植的中國研究》。

分項計畫主持人學術活動近況

（一）趙永茂教授

分項計畫主持人趙永茂教授於本季共出席兩場會議，擔任論文發表人，並發表期刊論文兩篇。

1. 會議論文

〈全球劃下的地方挑戰：都會民主及其治理〉

會議：第五屆地方自治與民主發展學術研討會

時間：2011 年 12 月 15 日

地點：東海大學

〈從臺灣地方自治發展經驗反思幾個政治發展的問題〉

會議：「2011 中國政治發展南北對話會——中國崛起：內政與外交的選擇」學術研討會

時間：2011 年 12 月 24 日

地點：廣東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

2. 期刊論文

〈提升我國直轄市治理能力之策略：以當前六都治理困局因應為例〉

期 刊：《研考雙月刊》第 35 卷第 6 期

時 間：2011 年 12 月

作 者：趙永茂教授（臺大政治系）

王皓平（臺大政治系博士生）

〈兩岸城市防救災制度結構之治理分析：以臺北市與北京市為例〉

期 刊：《公共事務評論》第 12 卷第 2 期

時 間：2011 年 12 月

作 者：趙永茂教授（臺大政治系）

左宜恩（美國北德州公共行政學系博士生）

（二）徐斯勤教授

分項計畫主持人徐斯勤副教授於 2011 年 12 月 24 日至 26 日前往中國大陸廣州市進行有關本計畫之田野調查。田野調查是當代中國研究的重要途徑；相較於西方學者，臺灣學者應具有運用在語言與文化上的優勢而「見人所未見」，從而提出獨到見解的優勢。然而，對於如何在中國進行田野調查，國內學界仍然缺乏系統性的論述與評估，制約了國內研究社群藉由精進既有優勢而創造獨特研究價值的可能性。因此本次前往中國大陸廣州市便是為取得第一手資訊，期能建立系統性之發展。

（三）林惠玲教授

本計畫完成的文章 "Ownership,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ese Electronics Firms" 於 2011 年 12 月投稿至 *China Economic Review*，目前已收到回函，正在修稿當中。另外有關大陸追趕臺商生產力方面的文章，正在撰寫中，預計 7 月底完成。本人原本擬於 3 月 11 日參加王作榮教授經濟與臺灣經濟發展研討會，但該研討會延至 5 月 12 日舉行。

（四）古允文教授與施世駿教授

古允文教授於 2012 年 2 月 5 日至 8 日前往香港大學訪問，發表〈建構長者服務的網絡：臺灣經驗的思考〉演講。以臺灣為主要案例，討論高齡化趨勢所帶來的社會影響，以及各部門（個人、家庭、社區、市場及政府）在建構友善長者服務網絡所應當扮演的角色。在傳統東方家庭主義的思維底下，家庭一直被認為是長者最好的服務歸宿，但家庭結構的轉變與全球化下工作機會的跨國移動，限制了家庭的福利功能；在臺灣復因民主化的壓力影響，政府大力干預與提供長者福利（尤其在經濟安全與健康照顧方面），成為家庭之外的重要長者福利支柱。然而新的趨勢已經發現，一個友善長者的環境需要跨部門的努力，尤其年輕與年長世代之間如何共同認知與面對高齡化的議題，將決定未來新社會安排的可能性。希望藉此引發兩岸三地學者合作研討的興趣，有多位學者表達合作的意願，規劃以舉辦工作坊方式，在今年（2012 年）邀請大陸、香港與臺灣學者發表主題論文，以出版專書或期刊專號為目標，作為計畫的第一年成果，並由此出發，凝聚更多可以深入發展的主題。

最近古允文教授並完成 "Unemployment Insurance in Taiwan: Challenges and Sustainability" 的撰寫工作，已通過韓國 *Korea Labor Institute* 審查，將共同出版一本有關亞洲地區失業保險的專書。

施世駿副教授於 2011 年 11 月 6 日至 12 日前往北京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與人民大學社會保障學系訪問，分別拜會了王春光主任與仇雨臨教授。接著在 2012 年 2 月 6 日至 17 日前往成都四川省社科院訪問，拜會了郭虹教授，並瞭解成都社會保障改革的情形。施世駿副教授同時也參與了香港教育學院 Ka-Ho Mok 教授有關東亞地區福利體制的書籍撰寫計畫。

本分項研究團隊於本季再獲刊論文一篇："Pension Privatisation in Greater China: Institutional Patterns and Policy Outcomes"，投稿於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作者為施世駿副教授。

（五）林端教授

分項計畫主持人林端教授在社會學系開設「中國大陸的宗教與社會」的課程（同時為社會學系與「中國大陸研究學程」的選修課），在 2012 年 1 月順利完成。除了在理論與實證等方面，廣泛探討大陸當前宗教發展的困境與遠景外，也會用兩週的課程，研討大陸宗教旅游的現況，廣泛應用此一計畫的研究成果。這門課獲得同學的熱烈支持與迴響，幾場有關大陸伊斯蘭教、基督教家庭教會與儒教的演講，更吸引了許多校外人士的參與。

此外，計畫主持人在 2012 年 2 月赴北京，在零下冬風陣陣之下，實地觀察北京白雲觀、牛街清真寺、西山臥佛寺、北京孔廟與國子監等宗教名勝的現況。並訪問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清華大學、中共中央編譯局、中國藝術研究院等單位，希望在既有的基礎上，展開彼此進一步的交流與合作。在北大拜訪社會科學部李強部長與社會系謝立中主任等，商洽暑假後前去協助開設短期「韋伯宗教社會學」相關課程以及出版專書的落實之道。在人大拜訪人類學趙旭東所長，以及提倡儒學復興運動的康曉光所長，對大陸亟盼在經濟建設之後，開展文化建設與社會建設多所討論，也希望未來能多方合作。清華大學拜訪社會系沈原主任等多人，對大陸轉型社會的陷阱廣泛交換意見。中央編譯局拜訪何增科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拜訪社會學所兩位學部委員景天魁與李培林，請教他們有關中共黨政重視社會建設、創新社會管理的時空背景。中國藝術研究院拜訪梁治平所長，敲定在他主編

的「法律文化叢書」裡，出版兩本新書。總而言之，十一、二天的北京行，收穫相當豐碩。

【計畫近況】

數位人文研究整合平臺⁺

平臺執行長： 項潔*

總計畫

近年來，隨著資訊科技的迅速發展與網際網路普及，數位資源的建置與應用已成為知識再現與傳播的重要形式。國際間許多學術組織不僅積極投入發展各具特色的數位資源，推動數位資源應用於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及教學中，更將數位人文研究（Digital Humanities）列為學術發展之重點項目之一。

所謂的數位人文研究即是利用資訊科技，協助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在大量且紛雜之數位資源中，重新分析建構資料間之可能意義關聯與脈絡，進而從中發掘出新的研究方向與研究議題。換言之，數位人文研究不僅能夠提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效率與品質，更可透過資訊科技技術的協助，拓展人文研究的視野。

本計畫之目的為協助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打造一個資源整合的數位人文研究環境，並探究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影響力與能見度的擴散，促進研究人才向下扎根與拓展國際交流合作。本計畫訂定四大目標如下：

一、建構人文社會科學數位知識中心：持續推動本校數位資源之累積與永續經營外，更將積極與校外單位進行數位化合作及技術交流，期藉此增進臺灣研究數位資源之深度及廣度，並使本校成為臺灣研究資料中心。

二、建立符合人文社會學科的學術影響力之量化指標及質化學術傳播模式：為探究人文學科研究的影響力與能見度的擴散，特別規劃以高研院項下計畫為研究分析對象，並期以「資訊傳播觀點探究學術研究影響力」及「探

⁺ 本平臺係本院執行第二期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之研究整合平臺。

* 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特聘教授、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主任、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究數位媒介在臺灣人文學科研究的影響力與能見度的角色」二項研究方法，建立符合人文社會學科的學術影響力之量化指標及質化學術傳播模式。

三、培育跨領域與數位人文研究人才：本計畫將每年透過舉辦工作坊、專題研討會及國際研討會等學術交流活動，及推動訪問學人計畫及研究生獎助計畫，培育新世代之跨領域與數位人文研究人才。

四、開拓國際交流合作關係：為學習數位人文研究相關之最新知識技術，推廣本校數位人文研究成果，本計畫將每年定期參與國外具有指標性的學術研討會，以及國際數位人文研究專業社群及其所屬機構成員所舉辦之相關會議與各類委員會，並積極與國際知名數位人文研究機構互動交流。

計畫執行近況

2012 臺大數典中心獎助生成果發表暨系統展示工作坊

日期：2012 年 3 月 8 日

地點：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三樓多媒體教室

主辦：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

【計畫近況】

東亞崛起中的日本與韓國研究整合平臺⁺

平臺執行長：
徐興慶^{*}

總計畫

臺灣與日本、韓國地理位置相近，經貿往來頻繁，在東亞區域安全問題上更是命運共同體。1972年迄今臺灣與日本斷交已近四十年，在沒有正式國交關係的情況下，日本政府在兩岸之間推行「一個中國+對臺實質關係」的外交模式，與臺灣維持了諸多領域的雙邊實質交流。又，臺灣雖然在1992年與南韓終止了國交，但近二十年來，雙方依然維繫著文教經貿往來的實質關係。據官方進出口貿易統計資料顯示，目前臺灣最大的貿易往來國依序為中國、日本、美國、韓國，顯見日、韓是臺灣在東亞國際社會的重要夥伴。在此國際化急速進展的時代，以東亞為視域，重新思考傳統日本、韓國文化與現代政經發展實有其必要性。

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浪潮與亞洲崛起之新發展蔚為趨勢，推動跨國學術交流已是刻不容緩的課題。

本平臺的目標，即是從東亞學術交流的角度切入，從區域層面到整體發展，建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之對話機制，發掘知識社群之多元問題意識，探索傳統與現代日、韓兩國的歷史縱身、文化形態；並從比較的視域，瞭解其之於現代西方文化的意義。為達到整合與服務之目標，促使六大計畫的日本、韓國研究更具國際競爭力，在方法與步驟上將：一、舉辦專題研究系列講論會；二、舉辦年輕學者暨研究生研習營；三、聚焦六大計畫主題，逐年擬定專一領域舉辦日本與韓國研究論壇或雙邊學術研討會；四、蒐集日本、韓國研究相關資料，

⁺ 本平臺係本院執行第二期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之研究整合平臺。

^{*} 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外國人研究員、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建置數位資料庫及研究網絡，並公開發表研究成果，以達到學術無國界的卓越目標。

計畫執行近況

本計畫於本季所舉辦之學術活動如下：

「東亞研究的新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

日期：2012年2月16-17日

地點：臺大法律學院霖澤館一樓國際會議廳

主辦：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東亞崛起中的日本與韓國研究整合平臺

「日本韓國研究之展望」研習營

日期：2012年2月18-19日

地點：臺大文學院演講廳、文學院 20 教室及
文學院會議室

主辦：東亞崛起中的日本與韓國研究整合平臺

【計畫近況】

歐盟研究整合平臺

歐盟科研架構計畫——社會經濟與人文主題國家聯絡據點⁺

平臺執行長：
沈冬^{*}

總計畫

國科會近年來積極推動與歐洲的學術研究合作，與歐盟科研架構計畫簽訂合作協議，於2008年成立「歐盟科研架構計畫——社會經濟與人文主題國家聯絡據點」（Socio-economic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Thematic National Contact Point, SSH-NCP），由中山大學廖達琪教授以及臺灣大學沈冬教授共同負責，而北部辦公室即將設置於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即為「歐盟研究整合平臺」。

本計畫的研究重點方向及趨勢，主要根據目前歐洲面臨的各種問題，試圖透過各式的研究來尋求解決方案，相當問題導向及應用導向。而在 SSH 領域目前擬定的八大研究主軸如下：

（一）歐洲知識社會裡的經濟成長、就業力及競爭力：創新、競爭力及勞動市場的相關政策、教育及終身學習、經濟結構與生產力。

（二）歐洲視野下經濟、社會及環境目標的整合——邁向永續發展的路徑：跨區域的經濟與社會連結、社會與經濟面向的環境政策。

（三）歐洲社會主要趨勢及影響：例如人口結構的改變、家庭與工作的協調、健康與優質的生活、青年政策、社會排除及種族歧視等等。

（四）世界的歐洲：全球化下歐洲與世界的互動及互賴關係，例如貿易、移民、貧窮、犯罪、衝突及其解決之道之相關研究等。

（五）歐盟的公民：如何跨越人民的差異以達到有效的公民參與，目前面臨的挑戰有政

⁺ 本平臺係本院執行第二期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之研究整合平臺。

^{*} 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教授、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治參與、公民的權利與義務、民主及課責性、文化差異性及價值觀等。

(六) 社會經濟及科學指標：微觀與宏觀層次政策制定之指標使用及其效果評估之相關研究。

(七) 前瞻研究：關於全球知識、移民、老化、風險及其他具有前瞻性領域之科學研究。

(八) 橫向行動：推動橫向聯繫、協助參與、與國際合作等策略行動。

計畫執行近況

人文社會科學討論會

本計畫與高研院合辦「人文社會科學討論會」之專題演講，於 2011 年 11 月在本校法律學院霖澤館七樓第一會議室舉行，講題為：〈歐盟的友誼策略——FP7 計畫的推動與展望〉，由平臺執行長沈冬教授主講。

會中不僅介紹 FP7 計畫的緣起與發展，更重要的是讓更多學者瞭解與歐盟交流之管道、促進臺歐學術交流。「歐盟研究整合平臺」將高研院成員列為重點輔導對象，請有興趣之學者主動提供研究領域，平臺將負責協尋相關計畫、計畫主持人的重要資訊。

活動預告

「歐盟研究整合平臺」將於 3 月 19 日至 20 日接待愛丁堡大學 Robin Williams 教授來訪。Williams 教授現職為該校科技創新研發中心主任，研究主題是「科技如何影響社會」(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同時也聚焦產業管理。Williams 教授從 1994 年起便積極參與歐盟 FP 計畫，屆時預計舉辦小型說明會，讓學者與 Williams 教授面對面交流。

【院務新訊】

新近出版品介紹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本院「東亞儒學研究計畫」所出版的《東亞文明研究叢書》書系，本季出版了一冊新書：

叢書 96，甘懷真教授編：《士族、身分與權力：士族研究新探》。士族是臺灣之中國史研究的重要課題，本書的論文反映了目前臺灣三十歲世代學者的士族研究傾向。全書的特色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在反省既有士族學說的前提下，從個案出發，希望能發掘更多的史實；二是從社會、學術、文化的樣態上，開發士族研究的新領域；三是從石刻墓誌的新史料再探中古士族的發展。此外，本書也嘗試由地域統治階級的觀點思考士族課題，在跨時代的比較研究下，討論了元代士人文化與清末民初士人文化的轉變。

《東亞儒學研究叢書》

本院「東亞儒學研究計畫」所出版的《東亞儒學研究叢書》書系，本季出版了一冊新書：

叢書 11，崔在穆教授著、錢明教授譯：《東亞陽明學的展開》。本書以闡明東亞三地域陽明學的展開過程及形態為目的，並對其進行比較論的考察。因此從廣義上說，本書是對建立在陽明學之上的東亞近世思想史進行研究的一種嘗試。本書研究對象所涉及的時代，涉

及明代中期至末期、朝鮮中期、江戶初期至中期。在王守仁的思想體系中，原本就存在著消向內的、靜態的、反省（省察）的消極之性格（重視工夫的傾向）與外向的、動態的、行為的積極之性格（重視本體的傾向）。這兩大思想傾向，貫穿於本書的全過程，因而它適用於各個部分思想形態的考量。本書第一部是考察陽明學的成立及其思想特質。第二部到第六部是在陽明學中挑選出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形態，即致良知論、萬物一體論、人欲論、權道論和三教一致論，然後對中國、韓國、日本的陽明學之展開的不同類型進行考察比較。

《全球在地視野叢書》

本院「東亞儒學研究計畫」所出版的《全球在地視野叢書》書系，本季出版了二冊新書：

叢書 04、05，林建甫教授編：《海峽兩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1949-2009）》上、下冊。本書探討近六十年來海峽兩岸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並聚焦在人文與社會學科中的重要發展脈絡。全書足以反映近六十年海峽兩岸學界的演變歷程，希望可以在探究過去發展的基礎上，開展未來可能的學術視野。

上冊 12 篇的內容涵括：戰後六十年以來，臺灣的中國史研究、考古學研究、人類學

的漢人社會研究、儒學研究、東亞儒學研究、中國近代城市史研究、京都學派哲學的研究、科技史研究、英國史研究以及二十世紀法國文學在中國的譯介歷程、革命史·快感·現代主義。不僅對各領域進行回顧式的爬梳整理，同時也對未來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作出展望。

下冊 11 篇的內容涵括：戰後臺灣的社會及人格心理學的研究、社會學在臺灣的發展、臺灣的宗教社會學研究方法與理論的回顧與前瞻、臺灣的領導研究、臺灣商管學術研究取向之分析與展望、臺灣在戰後的生產力與效率研究之發展、戰後總體經濟學與貨幣學在臺之發展、臺灣戰後會計學術之發展、海峽兩岸閱讀療法探索的進展及合作前景、組織學習過程的變革型領導與交易型領導比較研究、新政治史的視野與方法。不僅對各領域進行回顧式的爬梳整理，同時也對未來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作出展望。

【院務新訊】

院務短波

葉俊榮教授出席香港大學第四屆亞洲憲法論壇

本院「東亞法院與法律繼受研究計畫」總主持人葉俊榮教授應邀出席香港大學舉辦第四屆亞洲憲法論壇（4th Asian Forum for Constitutional Law，2011年12月16-17日），與子計畫主持人張文貞副教授共同發表論文："A Decade of Changing Constitutionalism in Taiwan: Transitional and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s"。

葉俊榮教授赴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講學

本院「東亞法院與法律繼受研究計畫」總主持人葉俊榮教授於2011年12月19日至2012年1月13日應邀前往中國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講學，為期三週。

項潔教授出席「2012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際研討會」

本院「數位人文研究整合平臺」執行長項潔教授於2012年2月21日出席由中央研究院舉辦之「2012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際研討會」（TELDA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12），並發表論文："Tracing the path to democracy—The Digital Repository of Taiwan Provincial Assembly and beyond"。

「國家發展論壇」《文化與文明系列》第一場討論會

本院與國家發展研究所於2011年12月23

日假法律學院霖澤館七樓第一會議室，共同舉辦「國家發展論壇」《文化與文明系列》第一場討論會，由陳明通教授擔任主持人，而由黃院長擔任主講人，講題是：〈東亞文化研究中的一個方法論問題〉。

本次討論會主要從方法論立場出發，思考21世紀全球化時代東亞文化交流研究的方法論問題。與會的專家學者有：國發所周桂田教授，政治系石之瑜教授，中研院朱雲漢教授、林月惠教授，臺師大張崑將教授等。

石之瑜教授訪談三位德國教授

本院「東亞崛起中當代中國大陸的發展變遷與『中國研究』主體性的轉換研究計畫」總主持人石之瑜教授，於2011年12月26日至2012年1月7日間，分別訪談中國海運史的兩位世界知名專家 John Wills 與 Leonard Blussé，以及 Erlangen-Nuremberg 大學 Michael Lackner（朗宓榭）教授。

「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本院與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學日本哲學史研究室於2012年1月5至6日共同舉辦「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地點在文哲所二樓會議室。本院黃俊傑院長除了主持第一場會議之外，並於第五場發表論文，題目為〈東亞文化

交流史中的「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現象及其研究方法論問題)。

徐興慶教授近期學術活動

本院「東亞崛起中的日本與韓國研究整合平臺」執行長徐興慶教授於 2011 年 12 月 22 日擔任公共哲學京都論壇「溝口雄三先生追思討論會」與談人；2012 年 1 月 6 至 7 日，出席東海大學跨領域日本區域研究中心主辦之國際研討會「中臺灣日本研究論壇」，並於 1 月 6 日參與圓桌論壇「防災防救、災後重建中的社會與文化、政治與經濟」之討論；2012 年 1 月 27 日至 28 日，出席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之研討會「日本語で書く－非母語文学の成立」，並擔任第二場「台湾、朝鮮、中国からの日本語文学」之評論人；2012 年 3 月 15 日，以〈台湾における日本文化〉為題，於大阪 21 世紀會進行專題演講。

第二屆青年學者東亞儒學研習營

儒家思想自唐宋以來就深入東亞地區的各個社會，在區域文化的差異下，孕育出各具特色的儒學，引領著各區域政治、文化與社會的發展。近年來，在全球化的潮流與亞洲的崛起等國際局勢的激盪下，以東亞為視野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漸成學術的趨勢，儒學的研究不例外，東亞儒學研究強調跨越國界的藩籬，從多元的角度重新理解東亞地區儒學思想的互動與文化的文流，除了用以促進東亞各國相互間的尊重與合作關係外，也企圖為東亞文化的未來尋求新的共識與發展的路向。

基於上述的學術理念，本院於 2011 年 8 月舉行「第一屆青年學者東亞儒學研習營」，2012 年 2 月 13 至 18 日，再與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世界朱氏聯合會以及本校國家發展研究所共同舉辦第二屆研習營，邀請黃俊傑

院長、世界朱氏聯合會朱茂男會長、中研院李明輝教授、臺師大張崑將教授，以及臺大徐興慶、陳昭瑛、張寶三、蔡振豐、林永勝等教授擔任主講人，希望藉此提供與會的兩岸四地一百五十多位青年學者一個討論的平臺，以達成下列的學術目標：

- 一、理解儒學思想之價值理念，並珍視儒學在東亞各國不同歷史文化下的互動與發展。
- 二、擴大儒學的研究視野，營造跨國界、跨文化、跨學科、多語言的學術社群。
- 三、以東亞儒學為中心，透過文化的承傳、交流與研討，開發具有全球性意涵的儒學理念。

除邀請上述九位學者擔任課程主講人，本次研習營還邀請中華文化總會劉兆玄會長、中華民國孔孟學會郭為藩理事長、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朱雲漢執行長、世界朱氏聯合會朱茂男會長、本校羅清華副校長等五位擔任致詞貴賓，給予青年學者諸多勉勵與期許。

「東亞研究的新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

本院配合第二屆青年學者東亞儒學研習營，與本院「東亞崛起中的日本與韓國研究整合平臺」共同主辦「東亞研究的新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時間為 2012 年 2 月 16 至 17 日，地點在本校法律學院霖澤館一樓國際會議廳。

本次會議共邀請中、日、韓等地區九位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演講，並舉辦兩場圓桌論壇，主題聚焦於社會科學觀點下及人文科學觀點下的日韓研究。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gricultural Ethics in East Asian Perspective"

本院於 2012 年 3 月 1 日假法律學院霖澤館七樓第一會議室，舉辦 "Agricultural Ethics in East Asian Perspective" 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就農業倫理等議題發表論文。會議開始由本院黃俊傑院長進行開幕致詞，接著邀請密西根大學 Paul B. Thompson 教授發表主題演講。本院唐格理副院長為此次會議的召集人，除統籌本次會議之外，還以 "Agricultural Ethics in East Asian Perspective: Some Issues" 為題發表論文乙篇。

Intercultural Humanism Conference Series "Humanity and Inhumanity"

本院與本校出版中心、德國 V&R Unipress 合作出版有關人文主義之系列叢書，並配合新書出版，於 2012 年 3 月 8 至 9 日假本校法律學院霖澤館七樓第一會議室，舉辦跨文化人文主義會議系列 "Humanity and Inhumanity" 研討會。

本次研討會特別邀請德國埃森大學 Jörn Rüsen 教授擔任召集人，邀請海內外十二位專家學者針對會議主題發表論文。本院黃俊傑院長及唐格理副院長分別發表論文 "The Reception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Zhu Xi's Discourse on Humanity in Tokugawa Japan" 和 "Humanity and Inhumanity: Confucian, Daoist and Mohist Reflections"。

項潔教授應邀出席 "4th Workshop of the Asia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Research Group"

本院「數位人文研究整合平臺」執行長項潔教授於 2012 年 3 月 13 日應邀出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召開之 "4th Workshop of the Asia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Research Group"，擔任主題演講，講題為 "From Digital Archives to Digital Humanities: The NTU Approach"。

黃俊傑院長韓文版新書《동아시아학 연구방법론——동아시아에서 문화교류와 유가경전의 이념》出版



동아시아학 연구방법론 ——
동아시아에서 문화교류와
유가경전의 이념
東亞學的研究方法論：
東亞的文化交流與儒家經典的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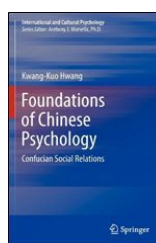
黃俊傑◎著
鄭培謨◎譯

首爾：心山出版社，2012 年

本院黃俊傑院專著《東亞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經典與理念：互動、轉化與融合》之韓文版，已由山東中國海洋大學鄭培謨教授翻譯成書，書名為《동아시아학 연구방법론——동아시아에서 문화교류와 유가경전의 이념》（東亞學的研究方法論：東亞的文化交流與儒家經典的理念），已於 2012 年 3 月由首爾心山出版社出版。

本書所探討的是在東亞文化交流的歷史脈絡，儒家經典及其價值理念與日本及朝鮮之地域性特質的互動、衝突或融合之問題，尤其聚焦於儒家經典的閱讀者之「自我」與「他者」之互動，以及經典中的知識與東亞各國權力結構之互動。

黃光國教授英文新書 *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 Confucian Social Relations* 在美國出版



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
Confucian Social Relations

Kwang-Kuo Hwang

NY: Springer, 2012

本院「東亞華人自我的心理學研究計畫」總主持人黃光國教授近期出版英文新書一本，書名為 *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 Confucian Social Relations* 由 Springer 出版社於 2012 年在美國出版。該書包括了一系列「含攝文化的理

論」(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黃教授企圖藉此作為「紮根於文化之心理學」的範例之一，對西方主流心理學發動一場「科學革命」(Evenden & Sanstrom, 2011)。

【院務新訊】

院內大事紀

2011年12月16日~2012年03月15日

日期	紀要
12月18日	「東亞視野中的保釣運動」研討會暨釣魚臺珍貴資料展
12月21日	東亞法院論壇系列（四） 沈冠伶教授主講： 「東亞法院的民事紛爭解決：東亞民事程序法制的繼受與變革」
12月23日	「國家發展論壇」《文化與文明系列》第一場討論會
01月05日	「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02月12日	東亞儒學研究計畫協調會議
02月12日	東亞儒學研究計畫叢書編輯會議
02月13日~ 02月18日	第二屆青年學者東亞儒學研習營
02月16日~ 02月17日	「東亞研究的新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
02月18日~ 02月19日	「日本韓國研究之展望」研習營

日期	紀要
03 月 01 日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gricultural Ethics in East Asian Perspective"
03 月 02 日	東亞法院與法律繼受學術研討會
03 月 08 日	2012 臺大數典中心獎助生成果發表暨系統展示工作坊
03 月 08 日~ 03 月 09 日	Intercultural Humanism Conference Series "Humanity and Inhumanity"